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亨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82 期

2011 年 3 月 15 日

苏联民族问题讨论专辑之四

目 录

【译 文】

作为公共寓所的苏联，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
助长族群特殊主义

尤里·斯莱兹肯（Yuri Slezkine）著，王惠琴译

多族群联邦国家的构建和崩溃：为什么俄罗斯存留而苏联解体

亨利·黑尔（Henry E. Hale）著，王 辉译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译 文】

作为公共寓所的苏联， 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助长族群特殊主义¹

尤里·斯莱兹肯（Yuri Slezkine）著 王惠琴译²

苏联民族政策的修订和执行都是由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推动的。承认民族（nation）和“民族权利（national rights）”的实在性，是列宁曾采取的最强硬的态度之一。列宁提出的有益于（“被压迫的民族”）的民族主义理论奠定了苏联政权的思想基础，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政策（NEP-time policy），倡导补偿性地“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并在国家支持下整合各民族的语言、“文化”、领土以及一个由配额制扶植出来的科层体系（quota-fed bureaucracy），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尝试。列宁的近卫军（The Lenin Guard）以适当的方式造就了国家的基础，其间，布哈林（Bukharin）于1923年迅速完成了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到非俄罗斯民族主义（non-Russian nationalism）的巨大跳跃。但是斯大林才是真正的“民族之父”（虽然这不能涵盖所有民族和所有历史阶段）。1928至1932年的“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俨然变成了族群多样性的奢华庆典，对此，每个州都提供了经费支持。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倒退（the Great Retreat）”，虽然减少了“兴盛民族（blossoming nationalities）”的活动领域，却呼吁这些已初有成效的民族进行更加密集的农耕生产；继伟大的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 War）之后，有关阶级从属于族群和支持民族主义（不只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者国外“民族解放运动”）的权威阐述，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不可侵犯的神圣原则。

如果这个故事听起来让人感到奇怪，那是因为有关苏联民族政策的绝大部分历史解释皆出自于这样一些学者，他们共享着列宁和斯大林的本体论民族（ontological nationalities）思想，坚持赋予民族以特殊权利，褒扬发展本民族文化和培养民族干部的行为，贬责那些不履行（更别说威尔逊主义 Wilsonian）民族自决承诺的行为，而且认定曾遭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痛骂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确等同于对语言/文化（即而）政治自治的信仰，这一信仰被资产阶级学者理解为民族主义。各种形式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看起来是如此的自然，马克思普世主义的俄文译本似乎是如此的俄罗斯化或者普世化，以至于这些学者中的大多数都没有注意到苏联政权中长期隐含的民族倾向（chronic ethnophilia）。我们可以将这些学者的失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将其解释为折曲、软弱或疏忽的一种标志。

本文试图澄清和呈现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在族群特殊主义（Ethnic Particularism）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³ 出于对个体权利的强烈抵制，他们迫切地、蓄意地、始终如一地发展与无产阶级的

¹ 英文原文题目为“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刊载于 *Slavic Review*, Vol. 53, No. 2 (Summer, 1994), pp. 414-452.

²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

³ 当然这不是最早的研究，但我相信这篇文章与之前发表的很不一样，我希望这一尝试是值得的。My greatest debt is to the work of Ronald Grigor Suny, most recently summarized in his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O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see also Kenneth C. Farmer, *Ukrainian Nationalism in the Post-Stalin Era*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0); Gail Warshofsky Lapidus, “Ethno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 Soviet Case,” *World Politics* 36, no.4 (July 1984): 355-80; Philip G. 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23, no.2 (January 1991): 196-233; Teresa Rakowska-Harmstone, “The Dialectics of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Problems of Communism* XXIII (May – June 1974), 1-22; and Victor Zaslavsky,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权利并不总是一致的集体权利。“世界上第一个工农联盟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将民族区域联邦主义制度化的国家，是第一个根据生物学意义上的民族（nationalities）对所有公民进行分类，并对以“民族”定义的特定群体实施优惠待遇的国家。¹ 正如 I·瓦列伊基斯（I. Vareikis）1924 年所写，苏联（USSR）是一个庞大的公共寓所，在这座寓所里面，“民族国家、不同的共和国和自治州、自治区”代表着“隔开的房间”²。相当引人注目的是，共产党作为“房东”仍在继续强化这些隔离，他们在称颂共产主义的同时，从来没有停止对隔离制度的颂扬。³

“民族（a nation）”，斯大林在他早期的论著中指出，“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上的稳定共同体”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这一定义在社会主义者中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但对民族起源、民族主义未来的宿命、前国家时期民族的性质、经济和政治之于民族国家的作用、民族“典型特征”的重要性等问题，却没有达成共识，分歧多多。然而，似乎每个人又都认为，不论是好是坏，人类都是由基于共同历史的、或多或少稳定的语言群体（*Sprachnationen*）组成的。⁵ 语言和历史（或“命运的共同体” [*Schicksalgemeinschaft* / “community of fate”]），它是语言统一体的前提条件兼结果）被普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中更具争议的条目也通常——尽管不总是很明确地——被认为是合法的。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试图将地域与民族分离，明确指出“命运的共同体”归根到底是物质共同体的命运（the fate of a physical community）。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则坚信“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和资本主义逻辑是相矛盾的，并将庞大的、具有“掠夺性”的民族国家视为经济扩张的工具。列宁也拒绝接受“民族文化”的观念，他认为我们通常提到的“格鲁吉亚人（Georgians）”、“乌克兰人（Ukrainians）”和“大俄罗斯人（Great Russians）”也是具有民族特征、民族利益和民族责任的。民族或许没有用处，又或许不会永远存在，但它的确活生生地存在于当下。

在列宁和斯大林看来，这就意味着“民族”可以拥有自己的权利：“民族可以组织自认为适合的生活，拥有在自治基础上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拥有与其他民族结成联邦的权利，以及完全退出联邦的权利。所有民族都是独立的，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⁶ 各个民族在人口规模大小方面不尽相同，因此存在小民族和大（甚至超级）民族之分。所有民族在社会发展程度方面也有差

Societies,” *Daedalus* 121, no. 2 (Spring 1992):97-121. On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s” and bilingualism, see the work of Barbara A. Anderson and Brian D. Silver, especially “Equality, Efficiency, and Politics in Soviet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1934-198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No.4 (October 1984): 1019-39; and “Some Factor in the Linguistic and Ethnic Russification of Soviet Nationalities: Is Everyone Becoming Russian?” in Lubomyr Hajda and Mark Beissinger, eds., *The Nationalities Fact 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For a fascinating analysis of state-sponsored nationalism in a non-federal communist state, see Katherine Verdery, *National Ideology under Socialism: Identity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Ceausescu’s Roma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¹ For an excellent overview of recent debates on the ethnic boundaries of political communities, see David A. Hollinger, “How Wide the Circle of the ‘We’?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Problem of Ethnos since World War Two,”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8, no.2 (April 1993): 317-37.

² I. Vareikis and I. Zelenshii, *Natsional’no-gosudarstvennoe razmezhevanie Srednei Azii* (Tashkent: Sredne- Aziatskoe gosudarstvennoe izdatel’stvo, 1924), 59.

³ For a witty elaboration of the reverse metaphor (the communal apartment as the USSR), see Svetlana Boym, “The Archeology of Banality: The Soviet Home,” *Public Culture* 6, on. 2(1994):263-92.

⁴ I. V. Stalin, *Marksizm i natsional’nyi vopros* (Moscow: Politizdat, 1950), 51.

⁵ For early Marxist debates on nationalism, see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 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H el ene Carr ere d’Encausse, *The Great Challenge: Nationalities and the Bolshevik State, 1917-1930*. (New York: Homes and Meier, 1992); Helmut Konrad, “Between ‘Little International’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Austro- Marxism and Stalinism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Richard L. Rudolph and David F. Good, eds., *Nationalism and Empire: The Habsburg Empire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Roman Szporluk,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Karl Marx versus Friedrich Li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⁶ Stalin, *Marksizm i natsional’nyi vopros*, 51. See also V. I. Lenin, *Voprosy natsional’noi politiki i proletarskogo internatsionalizma* (Moscow: Pilitizdat, 1965), passim.

别，因此存在落后民族（斯大林认为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说法）和“先进”民族之分。所有民族各自的经济角色（以及相关的阶级角色和道德角色）也不相同，有的是“压迫民族”，有的是“被压迫民族”¹。尽管如此，所有民族，不论多么“落后”，都是平等的，因为他们都平等地拥有独立自主权，也就是说，他们都拥有相同的权利。

什么样的社会阶级要求自决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实现自决等问题，自然牵扯到一些强有力的却又毫无意义的争论——所有争论越是激烈，就越没有意义，因为俄罗斯帝国（Russian Empire）中的大多数群体还远远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因此，这些民族，以马克思主义而言，还算不上是民族。² 另一个至今仍没有结果的尖锐问题，就是列宁始终坚持的“自决”的政治意义以及他晚年与斯大林关于在苏维埃国家（the Soviet state）实施民族自决的实用价值的争论。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是列宁和斯大林为追求严格地域意义上的自治定义而发起的共同运动，反对崩得（Bund）³和鲍威尔（Bauer）。但是这场运动在1917年后因革命胜利而停止，苏联的联邦主义将族群（ethnicity）和地域联合起来——至少在第一个20年内——并保证其他各种散居群体的文化权利。那场运动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于提出一种断言——不论是1917年之前，还是1917年之后都很少被挑战——主张所有区域可以被描述为既是“中世纪的”也是“现代的”，随着现代性被定义为民主（“基于大众情感（popular sympathies）”的边界），也随着民主带来“民族人口成分最大可能的同质性，”⁴ 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将根据“人民的情感和意愿来确定，”至少其中一些情感将会传承族群的边界（ethnic lines）。⁵ 如果这样将会培育出新的“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将同样被赋予平等的地位。⁶ 如果平等的地位（和经济理性）要求建立无数“自主的民族区域”，即使是最小规模，那么，这种区域也必须得到建立，而且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与大小不一的相邻区域”联合。⁷

然而，如果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赞同联邦制只不过是一个庸俗理想的观点，认为“民族文化”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杜撰，认为同化是一个用“流动的无产阶级（mobile proletarian）”来替代“愚昧”、“野蛮”及“粘在肥料上死气沉沉”农民的渐进过程，而且民族文化专家们也以充分理由赞同和默许了这一同化过程，那么，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民族-区域的自治体？⁸ 首先，这是因为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尚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列宁的社会主义者不得不“用所有的语言来宣讲和反对（民族文化口号），以使自己‘适应’所有地区和所有民族的要求。”⁹ 这些“民族”需要本民族语言、本民族学科和本民族教师（“甚至只是为一个格鲁吉亚儿童”），这样做的目的不仅在于要与“‘他们’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也在于在‘他们的’小农阶级和市民阶层中传播反对神父的和反资产阶级的思想”，还在于消除他们无产阶级信徒和自身思想中的民族主义病毒。¹⁰ 列宁青年时代在喀山形成的“明斯基体系（Il'minskii system）”是一个传教类型的工程。¹¹ “唯有母语”，明斯基指出，“才能真正地而

¹ The “oppressor” was not always “civilized,” as in most marxist analyses of Russia vis-à-vis Poland or Finland.

² Stalin, *Marksizm*, 37. The view of a nation (as opposed to nationality) as a “historical category belonging to a particular epoch, the epoch of rising capitalism” became something of a truism and was reconfirmed without debate at the X Party Congress.

³ “崩得”是19世纪末成立的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犹太人组织（政党），曾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多次受到列宁的批判（译者注）。

⁴ Lenin, “Kriticheskie zametki po natsional'nomu vosprosu” (1913), in *Voprosy*, pp. 32-34.

⁵ *Ibid.*, 33; and Lenin, “Itogi diskussii o samoopredelenii” (1916), in *Voprosy*, p.128.

⁶ Lenin, “Kriticheskie zametki,” p.26.

⁷ *Ibid.*, pp. 33-34.

⁸ *Ibid.*, 15,16; and Lenin, “O prave natsii na samoopredelenie” (1914), in *Voprosy*, 81 (footnote), and “O natsional'noi gordosti velikoroevov” (1914), in *Voprosy*, p. 107.

⁹ Lenin, “Kriticheskie zametki,” p. 9.

¹⁰ *Ibid.*, 9, 28; and “O prave,” 61, pp. 83-84.

¹¹ Isabelle Kreindler, “A Neglected Source of Lenin’s Nationality Policy,” *Slavic Review* 36, no. 1 (March 1977): 86-100.

不仅仅是表面地将人民引导到基督教道路上来”¹。斯大林在1913年写到，唯有母语才能让“鞑靼知识分子或犹太工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²以上两种皈依理论都认为“民族语言”是基督教传道者散播信息的一个最为清晰的渠道。所不同的是，更“保守的”传教士们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系统，认为为了“击败异族的信仰”，必须与“与异族进行全面斗争——抵制其道德、习俗以及整个群体内部的制度设置，”³而喀山（Kazan）的改革者和苏联族群政策（ethnic policy）的先驱们则相信民族（nationality）与信仰（faith）是毫不相干的。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校不论使用什么语言媒介，都要统一开设相同的马克思主义课程。⁴民族文化作为既存的事实，包含语言和“内部的制度安排”：民族（nationality）是一种“形式（form）。”“民族形式（national form）”可以接受，因为根本不存在民族内涵（there was no such thing as national content）。

列宁和斯大林早期为民族主义辩护（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信仰，认为族群界限是本质性的[ontological essential]，其核心是领土和政治理念⁵）的另一个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前者，有时被释为“大国沙文主义（great-power chauvinism）”，有百害无一益；后者，尽管瞬息万变，却有其合法性。前者是占有规模优势的不公平的结果；后者则是对歧视和迫害的一种反应。前者只能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以及胜利后的自律和自我净化来消除；后者则不得不采用情感抚慰和机智手法来减弱。⁶因此，提出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口号是痛悔前罪的姿态和举动。这一政策较易操作，并且可以在容忍“（民族）形式”方面走得很远。“一个少数民族会有不满，并非因为区域范围之外缺乏民族联盟，而在于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只要允许少数民族使用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不满的情绪将会自行消失。”⁷一个少数民族享有的权利和拥有的机会愈多，就会愈加“信任”前任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形式”的真正平等，将会展现民族主义的历史偶然性和与阶级实质的潜在统一性。

随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完成，无产阶级将创造一个彻底消除民族压迫的机会；这种机会将变成一个“唯一”的事实——“唯一”！——在所有范围内彻底实现民主化，包括根据人民“情感”划定的国家边界，也包括完全脱离联邦的自由。反过来，这也会促使民族张力和民族猜疑的彻底消失，加速民族交往和融合，进而导致国家的消亡。⁸

革命和国内战争（civil war）等“实践”也无法改变这一进程。布尔什维克新政府最早的政令就已经把胜利的民众描述为被赋有“权利”的“人民（peoples）”和“民族（nations）”⁹，声明所有的人民（peoples）都是自主平等的，并通过加入民族区域联邦以及脱离联邦的自由权来保障民族的自主权，支持“少数民族和族群的自由发展”，保证尊重民族的信仰、习俗和制度¹⁰。内战即将结束时，对地方联盟的需要和对现存实体（有时用族群加以定义）的识别与民族原则联合起来，生产出一种法定的分类（越来越多地用族群来定义），它包括苏维埃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劳动者公社（toiler's communes）。有些自治主体看起来比其他主体更加自治，

¹ Quoted in Isabelle Kreindler, “Educational Policies toward the Eastern Nationalities in Tsarist Russia: A Study of the Il'minskii system,” PH.D. Diss., Columbia University, 1969, pp.75-76.

² Stalin, *Markizism*, 21.

³ Veniamin, *Archiepiskop Irkutskii i Nerchinskii, Zhiznennye voprosy pravoslavnoi missii v Sibiri* (St. Petersburg: A. M. Kotomin, 1885), 7.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controversy, see Yuri Slezkine, “Savage Christians or Unorthodox Russian? The Missionary Dilemma in Siberia,” in Galya Diment and Yuri Slezkine, eds.,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The Myth of Siberia in Russi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18-27.

⁴ Lenin, “Kriticheskie zametki,” 7.

⁵ Cf. Ernest Cell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I; E. J.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9; John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3.

⁶ Lenin, ‘O natsionalnoi programme RSDRP’ (1913), in *Voprosy*, 41; idem, “O prave,” 61-62, 102; idem, “Sotsialisticheskaia revoliutsiia i pravo natsii na samoopredelenie” (1916), in *Voprosy*, 113-14.

⁷ Stalin, *Markizism*, 163. The same applied to national schools, freedom of religion.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so on.

⁸ Lenin, “Itogi diskussii o samoopredelenii” (1916), in *Voprosy*, 129.

⁹ ‘Peoples’ and ‘nations’ were used interchangeably.

¹⁰ *Dekrety Sovetskoi vlasti*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7), 1:39-41, 113-15, 168-70, 195-96, 340-44, 351, 367.

但“民族(nationality)”这类群体拥有的自治权利最多。“许多这样的人群(peoples)除了它们以前曾是俄国的组成部分,现在通过革命获得解放这一事实之外,它们相互之间再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也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¹ 依据列宁的看似矛盾实际却十分正确的说法,实现统一的最安全保险的方式就是允许形式的多样化。通过“培育民族文化”和设立民族自治州、民族学校、民族语言和任命民族干部,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克服民族之间的猜疑,获得所有民族大众的支持。“我们将会帮助你们发展你们的布里亚特(Buriat)、雅库特(Votiak)等群体的语言和文化,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将会融合进普遍的文化之中,革命和共产主义也会尽快到来。”²

对许多共产主义者而言,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奇怪。难道民族不是由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吗?无产阶级的利益不是应该超越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吗?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不是应该团结起来吗?所有拥护苏联的劳动者(toilers)不是应该在更加自决的情况下团结起来吗?1918年春,拉特西斯(M. I. Latsis)曾大肆抨击“联邦主义的荒谬”,并警示无止境地“培育共和国,”尤其是对不发达的族群(ethnic groups)如鞑靼人(Tatars)或白俄罗斯人(Belorussians),其危险的程度不亚于其荒谬的程度。³ 1919冬,罗弗(A. A. Ioffe)曾反对高速增长民族主义诉求,并呼吁在“具有缓冲作用的共和国(buffer republics)”内“结束分离主义”。⁴ 1919年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N. I. Bukharin)和皮达可夫(G. I. Piatakov)曾针对民族自决的口号和非俄罗斯民族(non-Russion)地区的族群(ethnicity)超越阶级上升到首要地位的现象,发起过一次彻底的言论抨击。⁵

对此,列宁的回答仍像往常一样坚定不移。首先,民族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讲我们不承认芬兰人(Finnish)而只承认辛劳的人民大众,这将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情。不承认那些现实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它也会强迫我们去承认它。”⁶ 其次,曾经是压迫民族的人需要获得曾经是被压迫民族的人的信任。

巴什基尔人(Bashkirs)并不相信大俄罗斯人(the Great Russians),因为俄罗斯人比他们更文明,过去常利用其文化优势来掠夺/剥削巴什基尔人。所以,在那些偏远的地区,“大俄罗斯人”这一名称代表着“压迫者”和“骗子”。我们应该把这点考虑进去。我们应该与此作斗争。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能通过法令来强行消除。我们对此应该十分谨慎。并且像大俄罗斯人这样的民族尤其应该小心,因为他们已经激起其他民族强烈的憎恨。⁷

最后,落后民族还没有发展到“从资产阶级当中分化出无产阶级”的程度,因而也就不要指望他们当中会产生出具有革命性、并坚决反对本族“首领(mullahs)”的阶级。⁸然而,如果将这些落后民族视为一个整体来与更“文明”的民族进行比较,他们由于具有受欺骗和被压迫的美德,因而就是**合法的无产阶级**。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最后阶段”)之下,殖民地的民族在全球已成为西方工人阶级的等同物。在(俄罗斯 Russion)无产阶级专政下,他们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直至殖民主义的经济和心理创伤痊愈为止。在这一时期,民族可等同于阶级。

列宁虽然在辩论上失利,但最终还是赢得了选举。因为,正如托姆斯基(Tomskii)所说,

¹ S. Dimanshtein, “Narodnyi komissariat po delam natsional’ nostei,” *Zhizn’ natsional’ nostei* 41 (49) (26 October 1919).

² S. Dimanshtein, “Sovetskaia vlast’ i melkie natsiona’ nosti,” *Zhizn’ natsional’ nostei* 46 (54) (7 December 1919). See also S. Pestkovskii, “Natsional’ naia kul’ tura,” *Zhizn’ natsional’ nostei* 21 (29) (8 June 1919).

³ A.P. Nenarokov, *K edinstvu ravnykh; Kul’ turnye factory ob’edinitel’nogo dvizheniia sovetskikh narodov, 1917-1924* (Moscow: Nauka, 1991), 91-92.

⁴ *Ibid.*, 92-93.

⁵ *Vos’ moi s’ ezd RKP(b): Protokoly* (Moscow: Gospolitizdat, 1959), 46-48, 77-81.

⁶ *Ibid.*, 55.

⁷ *Ibid.*, 106.

⁸ *Ibid.*, 53. In the same speech, Lenin argued that even the most “advanced” western countries were hopelessly behind Soviet Russia in terms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which meant that they could—and sometimes should—be regarded as integral nations rather than as temporarily isolated class battlefields). By being Soviet, Russia was more advanced than the advanced west.

尽管“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会说民族自决或民族运动是正常的或可取的”，但是绝大多数人似乎相信它们是“必要的魔鬼”，是不得不容忍的。¹ 于是，旨在获取民族身份（national status）和确认族群领土（ethnoterritorial recognition）的争夺仍在畅通无阻地持续。无论在文化习俗、语音系统还是词汇方面，克瑞申人（Kriashen，说鞑靼语的基督徒）都不同于鞑靼人（Tatars），因而需要设立一个特定的行政管理单元（administrative unit）²。楚瓦什人（The Chuvash）十分贫穷而且不会讲俄语，因而也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单元³。雅库特人（The Yakut）也值得拥有自己的政府，因为他们居住集中并且已准备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组织他们自己的生活”⁴。那些地缘上靠近雅库特的原始部落们也值得拥有一个专门的政府，因为他们广泛地分散在散杂居区域内，还没准备好管理他们的事务。⁵ 居住在西伯利亚地区的爱沙尼亚人（The Estonian）拥有自己的文学（文字）传统（literary tradition），因而需要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来给他们提供报纸。⁶ 西伯利亚地区的乌格人（The Ugrian）没有文学（文字）传统，因而需要“一个独立的政府”来“为正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民众指引一条光明之路，并发展他们的生活方式”⁷。地方知识分子、民族官员的理事会/首脑（Commissariat）、“本地人议会（native conferences）”和彼得格勒的民族志学者们都要求为他们设立制度性的自治权、行政机构（offices）和财政资助（为了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保护者[protégés]）。在已经获得了自治权之后，他们还不断得寸进尺，要求更多的行政权力和财政资助。

虽然中央提供的财政资助是有限的，然而自治区域和行政机构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庞大。随着它们的官僚机构和（至少在理论上）“母语”教育体系的完成，除了民族区域单元之外，在国家机构里也出现了民族单元，政党基层组织和地方苏维埃组织中出现了民族部门，大学院校里出现了民族人口配额。1921年，波兰人（Poles）收到了用他们的语言编写的154,000册新书，同时，被部分认可的克瑞申人（Kriashen）也收到了10册新书；阿塞拜疆（Azerbaijani）的共产党组织中出现了波斯人、日耳曼人、希腊人和犹太人的机构；莫斯科启蒙理事会（Commissariat Enlightenment）中有14个民族机构；俄国有103个地方政党组织都认为应该使用爱沙尼亚语进行商业贸易。⁸

然而，有些疑虑仍然没有消除。根据民族官员理事会一个成员的说法，语言的自我维护，对那些“弱小的、落后的和散居在一些先进文化之汪洋大海中的民族”而言，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为了用单一的语言创造一个对称的、几何学意义上完整的教育体系，不惜一切代价来无止境地保护和发展某个民族语言，而不考虑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文化构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倾向的努力是没有未来的。”⁹ 其他人认为这个时代的主题是经济理性，族群单位应被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实体替代，或者至少作为补充，而且这种经济实体必须建立在环境、工业和商业的密切关系之上。如果军事防卫区域能够跨越民族界限，那么经济区域应该同样可以跨越民族界限。¹⁰

¹ Ibid., 82.

² Fedor Kriuchkov, “O Kriashenakh”, *Zhizn' natsional' nostei* 27 (84) (2 September 1920).

³ R. EI' mets, “K voprosu o vydelenii chuvash v osobuiu administrativnuiu edinitsu. *Zhizn' natsional' nostei* 2 (59) (11 January 1920).

⁴ V. Vilenskii (Sibiriakov), “Samoopredelenie iakutov,” *Zhizn' natsional' nostei* 3 (101) (2 February 1921).

⁵ V. G. Bogoraz- Tan, “O prevobytnykh plemenakh,” *Zhizn' natsional' nostei* 1 (130) (10 January 1922); idem, “Ob izuchenii i okhrane okrainnykh narodov.” *Zhizn' natsional' nostei* 3-4 (1923): 168-177; Dan. Ianovich, “Zapovedniki dlia gibnushchikh tuzemnykh plemen,” *Zhizn' natsional' nostei* 4 (133) (31 January 1922); TsGAOR, f. 1377, op. I, d. 8, 11.126-27. d.45, 11. 53, 77, 81.

⁶ “Chetyre goda raboty sredi estontsev Sovetskoi Rossii”, *Zhizn' natsional' nostei* 24 (122) (5 November 1921).

⁷ TsGAOR, f. 1318, op. I, d. 994, l. 100.

⁸ See *Zhizn' natsional' nostei* (1921) and TsGAOR, f. 1318.

⁹ L. Segal, “Vserossiiskoe soveshchanie rabotnikov po prosveshcheniiu narodov ne-russkogo iazyka”, *Zhizn' natsional' nostei* 33 (41) (31 August 1919).

¹⁰ I. Trainin, “Ekonomicheskoe raionirovanie i natsional' naia politika”, *Zhizn' natsional' nostei* 21(119) (10 October 1921); S. K., “Ekonomicheskoe raionirovanie i problemy avtonomno-federativnogo stroitel' stva,” *Zhizn' natsional' nostei* 25 (123) (12 November 1921)

这些争论没有被领袖们简单地拒绝。但自 1922 年开始，他们变得在思想上无法接受这些争论。列宁的激情 (passion)，斯大林的 Narkomnats 官僚组织，俄共 (布) 决定政策的传统和族群组织扩展的既得利益把“民族问题”凝结成为一个不能再被质疑的问题，以至于当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将族群制度化的 (institutionalized ethnicity) 政策予以合法化时，再也没有人称它是一个“必要的魔鬼”，更谈不上认为它会引发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问题。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 (尤其是斯大林) 所做的就是对列宁的民族压迫的主题和殖民解放进行合并，并把“民族问题 (nationality question)”和落后问题等同起来，将全部的问题看成是“大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一种单纯的对立。大俄罗斯人属于一个先进的、过去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他们必须频繁地为民族国家的安全传统和“大国沙文主义” (以族群自大和迟钝而著称) 而愧疚，而所有其他的民族，则通通被消极地定位为“非大俄罗斯民族，”他们都是沙皇所强加的没有建国机会 (tsarist-imposed statelessness)、贫穷落后和“无文化 (culturelessness)”的受害者，这使他们很难充分利用革命提供的新机会，甚至有时会诱使他们陷入“地方民族主义。”¹ 在斯大林的构想和规划中，“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RSFSR)，民族问题的实质是要消除民族从历史传承下来的落后状态 (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以便让这些落后民族赶上位于核心地区的俄罗斯。”²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俄共 (布) 将会帮助他们。

(a) 以一种符合这些群体的民族外观的形式，来发展和强化他们在苏联的国家地位；(b) 采用他们自己的法庭和政府机构，这些机构是由熟悉当地生活和心智状态的本地人组成的，这将会强化他们本民族语言的功能；(c) 用他们本族的语言发展他们的出版机构、学校、剧院、地方俱乐部以及其他文化性和教育性的公共机构。³

享有不同程度自治权的民族国家，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RSFSR) 内的民族 (nationalities) (不是 nations!) 在数量上是一样多的。游牧民族将接受哥萨克人 (Cossacks) 曾占据的土地，散居在他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的“民族的自由发展”也会得到保障 (这是对建立地域单元的呼吁)。⁴ 也许最显著的是，族群 (ethnicity) 的这种胜利，被斯大林同时描述为进步的原因和结果。一方面，“民族自由发展”是战胜非俄罗斯民族落后状态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你们不能违背历史。尽管俄罗斯人仍在乌克兰人的城市占据着主导地位，然而，清楚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城市都必然会实现乌克兰化。大约 40 年前，里加 (Riga) 曾是一个日耳曼人的城市，但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扩张，里加现在完全是一个拉脱维亚的城市。大约 50 年前，匈牙利 (Hungary) 的所有城市都是日耳曼性质的，然而现在已经马扎尔化了 (Magyarized)。同样的情况将会发生在白俄罗斯人身上，目前他们的城市中是非白俄罗斯人占优势。⁵

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俄共 (布) 将会加倍努力地进行国家构建，因为，“为了在城市开展共产党的工作，用本民族语言来争取新兴的白俄罗斯无产阶级的支持将是十分必要的。”⁶

然而，依据官方政策的“辩证”逻辑，这种措施是毫不含糊的，并且截止到 1921 年，已建立得相当完好了。在某种意义上，俄共 (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对新经济政策的引入，相当于降低其他目标来达到与“新经济政策相似的 (NEP-like)”民族政策的水准。新经济政策和正视“落后” (“落后”一般指的是农民、商人、女性和所有非俄罗斯民族，尤其是各种“原始部落”) 谨慎地达成了临时的和解。此外还存在一个专门的妇女部门，一个犹太人机构和北部边疆地区民族援助委员会。“落后”永无止境地自行增殖，在对待过去的每一个残留时，都需要一种基于“特

¹ Desiatyi s'ezd Rossiisk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Gosudarstvennoe izdatel' stvo, 1921), 101.

² Ibid.

³ Ibid., 371.

⁴ Ibid., 372.

⁵ Ibid., 115.

⁶ “Belorusskii natsional'nyi vopros i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ia,” *Zhizn' natsional'nostei* 2 (131) (17 January 1922).

殊性质”的特定方法，即要有深厚感情和父亲般的仁慈。最终的目标是消除所有的“落后”，从而消除所有的差异。但是那个目标的实现日期却被无限地延长了。任何强制性的尝试都将是“危险的”和“乌托邦式的”——正如中亚那些缺乏耐心，“十分成熟且政治意识较强的朋友”发出的疑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对自治体的培育要持续到什么时候？”¹俄共（布）给出的答复虽然不明确但却很有力：“视其需要的时间而定。”用他们所需的时间来克服“经济的和文化的落后面貌……，经济差异，文化习俗差异（这对那些还尚未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民族尤其重要）”以及语言差异。”²同时，这种国家建构，就本身而言，似乎也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美的存在，来源于差异性和多元化。

不过有一个例外。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独特的残余，基本上已无补救的余地。对此，我们只有容忍，而不是赞美；可以利用，但不是欣然接受。这就是俄罗斯的小农阶级。小农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新经济政策联盟，似乎反映出与其他“不发达”群体相似的安排，只是它们的官方依据不同而已。“小农成分”是好斗的、传染性的和险恶的。没有人认为其野蛮本性会通过进一步发展而自行消失，因为顽固到“不易觉醒”的俄罗斯小农，作为农民（“本质（in content）”上是不相同的）是没有能力自行发展的。

通过将族群（ethnicity）和发展等同起来，把所有国内人口分为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方式，对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已经表示认可和强化。俄罗斯人较为发达，占据着优势地位，因此与“族群”概念不相关。没有为俄罗斯人“明确标示出来”属于他们的地域，他们拥有的土地是那些没有被作为“民族”的非俄罗斯民族认领的那些领土。米高扬（Mikoyan）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分化太过简单，认为阿塞拜疆人在文化和经济上都要“超出众多俄罗斯的省份”，亚美尼亚的资产阶级分子还被斯大林和俄共（布）代表大会视为帝国主义者而开除。³

“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最后奋斗”也未能改变官方的政策方针。⁴对斯大林强硬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感到不安的捷尔任斯基（Dzerzhinskii）和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认为划定“俄罗斯人”的依据如果不是民族起源，就该是行为和职业，认为身体状态本身不佳的领导人推荐了太多相同的药方。部分俄罗斯人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不仅应该涵盖民族形式的平等，还应该包括压迫民族在经费支出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补偿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不平等’”⁵。这一点招致了更多的（非常多的）针对“‘被伤害’民族（‘offended’ nationals）”的“防备、差异和妥协”，也导致俄罗斯组织中出现了更多神志清醒的（非沙文主义的）无产阶级，以及对广泛使用非俄罗斯语的更大重视。⁶

1923年4月，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适度地重申了这一观点，但仍然没有质疑原有的策略和正视新出现的紧迫情况。唯一挑战民族发展正统学说的会议代表自认为是“等级确定的工人（rank-and-file worker）”，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马克思国际主义性质的无产阶级理论，却遭到了季诺维也夫（Zinov'ev）的责骂⁷。在两类比较极端的专家意见中，斯大林认为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主要风险”（“占九成”），而布哈林（Bukharin）则坚持认为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唯一的风险。⁸虽然解决民族表征和民族区域联盟问题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列宁主义民族政策”所坚持的原则依然固定不变。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autonomization plan）”呼吁要在“所

¹ Vareikis and Zelenskii, *Natsional'no-gosudarstvennoe razmezhevanie*, 57.

² Ibid., 60. 'Nations that have not yet reached the capitalist stage' were not nations according to Stalin's definition.

³ *Desiatyi s'ezd*, 112, 114.

⁴ For tw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see Moshe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 (New York: Pantheon, 1968); and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⁵ V. I. Lenin, "K voprosu o natsional'nostiakh ili ob' avtonomizatsii," in *Voprosy*, 167.

⁶ Ibid., 168-70.

⁷ *Dvenadtsati s'ezd Rossiisk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bol' shevikov)*,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Glavpolitprosvet, 1923), 462, 552.

⁸ Ibid., 439-54, 561-65.

有重要的事务”上实现更高度的中央集权，同时保证把“语言”和“文化”这些不重要的事务都留给“真正实现内部自治的共和国”¹。甚至有关格鲁吉亚事件的激烈讨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无济于事，这一讨论过程夹杂着（格鲁吉亚内部）“被伤害民族”对缺乏情感（insensitivity）的抱怨情绪和直指格鲁吉亚语在当地的优势地位和过度民族优惠的“大国沙文主义”。据奥尔忠尼启则统计，格鲁吉亚人占第比利斯市（格鲁吉亚首都 Tiflis）总人口比例的 25%，而在城市苏维埃中占 43%，其中 75%的是城市执行委员会委员，且其中 91%的是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而且所有的人都是共和党（*republic Sovnarkom*）兼共产党的核心委员会成员。² 这次大会产生的唯一真正的理论创新并没有得到讨论，而且最后证明是短命的：斯大林采用米高扬（Mikoyan）的原有立场来反对列宁的书面指责，试图强行削弱俄罗斯人的帝国主义垄断，并把“地方民族主义”重新定义为大国沙文主义的缩影。格鲁吉亚人曾压迫过阿布哈兹人（Abkhazians）和奥塞梯人（Ossetian），阿塞拜疆人（Azeris）曾欺压过亚美尼亚人，乌兹别克人曾歧视过对土库曼人（Turkmen）等。实际上，斯大林反对格鲁吉亚退出外高加索联邦（Transcaucasian Federation）的主要理由，是格鲁吉亚官员发起了旨在“驱逐当地亚美尼亚人”和“变第比利斯为真正的格鲁吉亚首都”的运动。³这就意味着基辅（Kiev）的乌克兰化和明斯克（Minsk）的白俄罗斯化或许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这次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既没有接受也没有忽视斯大林的思想。“大国沙文主义”明显是为俄罗斯人保留的，“地方民族主义”不得不冒险反对俄罗斯人（anti-Russian），这可能不是“主要危险”，但对肇事者而来是相当危险的。民族区域属于拥有该民族名称标注的那些民族。

然而，“民族”究竟是什么？在二月革命时，认为所有沙皇臣民的唯一特征是“宗教信仰”，因为俄罗斯人的民族认同和沙皇王朝的合法性与东正教是密切相关的。这并不是说所有沙皇臣民和所有东正教信徒都是俄罗斯人，而是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期待成为东正教的信徒。非东正教徒也可以力所能及地伺候沙皇君主，但是他们没有特定皈依运动（occasional conversion campaigns）的豁免权，并且不允许与异族通婚。一些非东正教信徒还被指称为“异类（aliens）”，这个术语，就词源学意义（“非家族”，“非本土”）而言表示有基因差异，事实上却经常被诠释为“非基督教徒”或“落后的人”。这两种观念反映出莫斯科人（Muscovite）（“前现代”）和圣彼得堡人（petrine）（“现代”）的他者观念，现在两种观念被交换着使用。一些受过洗礼的共同体因为过于落后而不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宗教信仰（如“穆斯林”、“喇嘛教徒”）被理解为不同发展程度（“定居”、“游牧”、“流浪”）的“生活方式”，所有异类/他者在形式上被分成了很多类。随着国家赞助教育的展开，以及行政人员为推动“东方异类”⁴和掌控已俄罗斯化西部的非俄罗斯民族的自主教育制度而做出的努力，“民族语言”变成了一个政治意义丰富的范畴。然而，语言的名称并不总是与集体名称相一致的。集体名称能够多方面地用来定义共同体，既可用于指自己，也可以指他者。二月革命前夕，俄国政府曾对民族、民族主义党派和民族“问题”进行过普查，但是关于什么可以构成“民族”，官方依然没有表态。

二月革命前夕（确切地讲，是尼古拉斯二世让位于莫吉廖夫和被关押的普提洛夫工人涌入彼得格勒街道的前一天），俄国科学委员会主席 S. F. OI' denburg 写信给外交使节波克罗夫斯基（N. N. Pokrovskii），他在信中提到，由于被一种爱国责任意识所打动，他和他的同僚提议组建一个研究俄国边陲地区部族构成的委员会。

当下对处于俄罗斯边界与敌对国家接壤的居住在边界两边地区的这些部族构成进行最周密测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原因是一场关于民族问题的世界大战正在蔓延开来。在和平协

¹ Quoted in Nenarokov, *K edinstvu*, 116-17.

² *Dvenadtsatyi s'ezd*, 543-45.

³ *Ibid.*, 449.

⁴ See, for example, “S” *ezd po narodnomu obrazovaniu*, *Zhurnal Ministerstva narodnago prosvieshcheniia* L (March-April 1914): 195, 242-44.

商的时期内，对各民族区域的正当性进行认定将变得尤为重要，因为即使迫于特定的战略和政治考虑要划定新边界，民族因素仍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¹

临时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执政时期，民族问题进一步向内地转移，并且新委员会承担了对俄罗斯所有人口（不只是边疆地区人口）进行研究的任务。布尔什维克党执政时期，“苏联民族政策的核心”是要保证“行政边界与民族边界的一致，”²这就意味着帝国的绝大多数领土将不得被分割出多个边界（borderland），而且专业的民族志学者必须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里没有时间详细讨论专业术语。异类和基督教徒被一个无差别的集合体取代，这一集合体中包括了“人民”（*narody* [peoples]）、不发展的弱小民族（*narodnosti*）、少数民族（*natsional'nosti* [nationalities]）、民族（*natsii* [nations]）和部落（*plemena* [tribe]）。而且对这些实体存在的持久性（和领土的合法性）没有任何争议之处。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委员会下属高加索部门的领导人尼·雅·马尔（N. Ia. Marr）认为，将民族考虑得过于“瞬息万变”和错综复杂会脱离“原始的地域划分”，而且还要努力（实际上要付出最艰辛的努力）解开“早期族群”和“部落的真正成分”之谜。³把语言作为“部落的标记”是最为普遍的做法。俄共的理论家赞成把“民族语言教育”作为他们民族政策的基础；掌管教育的官员可以把“民族文化的语言定义”作为切入点开展工作；⁴民族志学者倾向于将语言作为族群性（ethnicity）最可靠的指标，虽然不是那么通用。因此，E. F. Karskii，这个白俄罗斯部落民族人口分布图（*Ethnographic Map of the Belorussian Tribe*）的绘制者，也把母语作为衡量民族差异的“唯一标准”，并以一种典型的不合逻辑的推论，声称讲白俄罗斯语的立陶宛人（Lithuanians）应该被识别为白俄罗斯人。⁵更加矛盾的是，中亚的萨特人（Sart）（通常被识别为定居的穆斯林）被认为是不存在的，许多帕米尔人的共同体变成了“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被极端地定义为包括撒马尔罕（Samarkand）、塔什干（Tashkent）和布哈拉（Bukhara）地区所有讲突厥语（Turkic）的人。⁶

然而，语言始终不是最恰当的标准。1926年人口普查就呈现出“语言”和“民族”这两个不对等的分类结果，由此揭露出人口多的群体有些成员不讲“自己语言”的事实。这样的共同体被民族志学者⁷认为是“去民族化的”，而且这在党政官员和地方精英看来，是完全不合法的：讲俄罗斯语的乌克兰人或者讲乌克兰语的摩尔达维亚人（Moldavians）会被要求，甚至是被强迫，去学习他们的“母语”，而不考虑他们的母亲是否会讲这种语言。

是什么使“去民族化”的卢里塔尼人成为卢里塔尼民族？因为，它是由“物质生活”、“习

¹ *Ob uchrezhdenii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Izvestiia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Petrograd: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1917), 1:8.

² I. Gertsenberg, "Natsional'nyi printsip v novom administrativnom deleni RSFSR," *Zhizn' natsional'nosti* 37 (94) (25 November 1920).

³ N. Ia. Marr, *Plemennoi sostav naseleniia Kavkaza: Trudy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Petrograd: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1920), 3:9, 21-22. See also N. Ia. Marr, "Ob iafeticheskoi teorii," *Novyi vostok* 5 (1924): 303-9.

⁴ "The richest associations and the strongest perceptions are those acquired through the mother tongue" (Segal, "Vserossiiskoe soveshchanie").

⁵ E.F. Karskii, *Etnograficheskaia karta Bieloruskago plemeni: Trudy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vol.2 (Petrograd: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1917).

⁶ I. I. Zarubin, *Spisok narodnostei Turkestanskogo kraia: Trudy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vol.9 (Leningard: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1925); I. I. Zarubin, *Naselenie Samarkandskoi oblasti: Trudy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e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vol. 10 (Leningard: AN SSSR, 1926); Edward A. Allworth, *The Modern Uzbeks: From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0), 81; Alexandre Bennigsen and Chantal Lemerrier- Quelquejay, *Islam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raeger, 1967), 181-33; Teresa Rakowska- Harmstone, *Russia and Nationalism in Central Asia: The Case of Tadzhikist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78.

⁷ *Instruktsiia k sostavleniiu plemennykh kart, izdavaemykh Komissie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Trudy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Petrograd: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1917), 1:11.

俗”和“传统”共同组成的“文化”组合体。所以，在“俄语”和“白俄罗斯语”相互混杂的地区，Karskii 就参照服饰和建筑的差异在居民中区分他们的族属。¹ 同样，尼·雅·马尔(N. Ia. Marr) 基于“族群文化”、“大众信仰”、“生活方式”以及“对高加索的情感依恋度”，把操波斯语的奥塞梯人和塔里什人(Talysh)类归为北高加索人(north Caucasus)。² 有时候，宗教作为文化要素，会超越语言成为一个关键的族群标志，例如，克瑞申人(Kriashen，说鞑靼语的基督徒)得到他们自己的“部门”(department)，阿札尔人(Adzhar)(说格鲁吉亚语的穆斯林)得到了自己的共和国。马尔代表另一穆斯林群体(讲亚美尼亚语的 Khemshil 人)曾提出过类似的呼吁，但是却没有成功³。地貌地形可以强化文化、宗教和语言(高地的高加索人与低谷的高加索人相对)，时间的先后同样能起到类似的强化作用。以高加索人为例，本土人与外来移民的区分并不一定与基于发展程度的二元对立(发达/落后，译者注)相一致，西伯利亚的情况也是如此⁴。体质的(“种族的”、“身体的”)形态则从来没有单独使用过作为族属划分的标准，但有时候——尤其是在西伯利亚——会被用来支持其他的区分特征。⁵ 最后，对于草原游牧部落而言，以上特征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草原游牧民的“民族意识”或者“部落认同”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其他标准起不到任何作用。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和土库曼人之间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差异或许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他们的氏族谱系是如此清晰而且受到极力维护，以至于民族志学者没有其他选择，唯有遵循他们的谱系来确定他们的民族。⁶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新族群单元的实际边界并不总是与学者倡导的边界相一致。哈萨克的当权者要求得到塔什干地区，而乌兹别克的当权者则希望欧什地区(Osh district)获得自治权，为此，莫斯科中央委员会还成立了专门的仲裁委员会。

接着，吉尔吉斯人(Kirgiz，即哈萨克人 i.e. Kazakh)⁷放弃了对塔什干地区整体的领土要求，但对塔什干下属三个地区(three volosts)的领土要求更加坚持，要求它们必须归属于哈萨克斯坦。如果这个要求被完全满足，那么向塔什干供水的运河的某些部分……将会被封闭在吉尔吉斯领土上。……此外，如接受吉尔吉斯人的新版图，意味着在距塔什干南部 17 俄里的吉尔吉斯楔入区将切断横穿中亚的铁路干线。⁸

如此怪异的战略，或者“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考虑(正像哈萨克对乌兹别克)，以及更多不同程度的常规政治和经济优先权，影响了民族区域单元(ethnoterritorial units)的最终成型，但毋庸置疑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评判标准还是族群的(ethnic)。“民族(nationality)”意味着不同地区存在不同情况，但多数边界都被看成是“民族的(national)”，而且确实与部族研究委员会所绘制的民族分布图非常相符。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官员认为，族群的合法化就是对族群抱怨和发展限制作出的退让，但并非一种明智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列宁和斯大林居然还满怀信心地断言：真正的“民族界限”越多，国际民族主义就会越成功。

从短期来看，民族界限的划分将引发出一个令人困惑的、而且明显是族群相互嵌套(ethnic nesting dolls)的无限集合。所有非俄罗斯民族作为“民族(national)”都有资格取得属于他们的地域单元，所有生活在“其他群体地域”内的以“民族”定义的群体作为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也都有权获取属于他们的地域单元。截止到 1928 年，许多共和国都容纳了“民族自

¹ Karskii, *Etnograficheskaia karta*, 19.

² N. Ia. Marr,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Kavkaza: Trudy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Petrogard: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1920), 9: 24-25; N. Ia. Marr, *Talyshi: Trudy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Petrogard: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1922), 4: 3-5, 22.

³ Marr, *plemnoi sostav*, 9.

⁴ *Ibid.*, 59-61, Cf. S. K. Patkanov, *Spisok narodnostei Sibiri: Trudy Komissii po izucheniiu plemennogo sostava naseleniia Rossii* (Petrogard: Rossiiskaia Akademiia nauk, 1923), 7:3.

⁵ See, for example, Patkanov on “Paleoasiatics” in Patkanov, *Spisok*, 8.

⁶ VI. Kun, “Izuchenie etnicheskogo sostava Turkestana,” *Novyi vostok* 6 (1924): 351-53; Zarubin, *Spisok*, 10.

⁷ 在沙俄时期，中亚突厥语系的哈萨克、吉尔吉斯人等群体被统称为吉尔吉斯人(Kirgiz)，译者注。

⁸ I. Khodorov, “Natsional’ noe razmezhevanie Srednei Azii,” *Novyi vostok* 8-9 (1926): 69.

治共和国”(national okrugs)、民族自治州(national raions)、民族区苏维埃委员会(national soviets)、民族执行委员会(tuzriki)、土著人苏维埃委员会(native soviets[tuzemnye soveti])、aul(aul'nye) soviets、氏族委员会(clan[rodovye] soviets)、游牧民族苏维埃委员会(nomadic[kochevye] soviets)和营地委员会(encampment committees [lagerkomy])。¹ 他们各自在各自的边界内进行防卫,苏联范围内的所有民族都可以发展,如果必要,甚至可以创造他们的自治文化。这种工作的关键在于要尽可能最广泛地使用本民族语言——“本族语言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方式,是民族的一种社会整合,还是经济和文化顺利发展所需的最重要条件。”² 同时作为设立民族自治权的主要理由,是让这种自治权真正具有民族性的最重要方法,“民族语言”可以是所在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几乎总是通过该共和国的名称表现出来的³),可以是少数民族的官方语言,还可以是特定个体的母语。地域单元的增长和扩散似乎暗示我们:最终会出现一种属于绝大多数人的官方语言,尽管这样会产生国家赞许的能说三种语言的现象(trilingualism)。1926年,讲阿布哈兹语的阿布哈兹人,曾一度是讲格鲁吉亚语的格鲁吉亚的组成部分,他们拥有43个亚美尼亚语学校、41个希腊语学校、27个俄语学校、2个爱沙尼亚语学校和2个德语学校⁴。总的来看,所有这192种于20世纪20年代被认可的语言迟早将会变成官方正式语言(offical languages)。

然而,一种语言要成为官方语言,就必须“现代化”。这就涉及到了文字标准的创制或进一步修订,这种标准要以“活生生的大众言语”为基础,并通过一种“合理的”拼音符号系统(所有阿拉伯语和一些斯拉夫语的书写系统都被拉丁语摒弃)和“净化过的外来词汇(purged of alien ballast)”表达出来。⁵ 因此,一场清洗/净化运动或是制度化的语言纯粹主义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其原因就在于,如果“民族”是由文化(形式)的差异决定的,如果语言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最重要特征”,那么,各族的语言必须要尽可能地相互区别。⁶ 于是,地方知识分子在中央权力机构的鼓励下(或当这些缺场时,由居住在大都市的拥护“本民族”的学者上场),开始划分语言之间的界限。乌兹别克文字和鞑靼文字的缔造者在“阿拉伯主义(Arabisms)和法尔斯主义(Farsisms)⁷”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正统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语言的筹划者发起了抵制“俄罗斯主义(Russisms)”的运动,缺乏精英的“弱小民族”的守护者把新编创的楚科奇(Chukchi)语言从英语借词法中解放出来了。⁸ 鞑靼作家和记者首次采用了以上五个观点中的两个,具体如下所述:

I. 鞑靼文字语言的主要素材应该包含民族语言的要素,如果一个必要的词汇出现在鞑靼语中,那它绝对可以被一个意义相同的外来词所取代。

¹ See, for example, S. Dimanshtein, “Desiat' let natsional' noi politiki partii i sovlasti,” *Novyi vostok* 19 (1927): vi; “Vremennoe polozhenie ob upravlenii tuzemnykh narodnostei i plemen Severnykh okrain,” *Severnaia Azia* 2 (1927): 85-91; N. I. Leonov, “Tuzemnye soveti v taige i tundrakh,” *Sovetskii Sever: Pervyi sbornik statei* (Moscow: Komitet Severa, 1929), 225-30; Zvi Y. Gitelman, *Jewish Nationality and Soviet Politics: The Jewish Section of the CPSU, 1917-193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289;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58.

² I. Davydov, “O probleme iazykov v prosvetitel' noi rabote sredi natsional' nostei,”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 nostei* 1 (1929): 18.

³ After the abolition of the “Highland”(Gorskaia) republic, the only autonomous republic that had to ethnic “landlord” and hence no obvious official language was Dagestan, one of the most linguistically diverse places on earth (see A. Takho Godi, “Problema iazyka v Dagestane,”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 nosti* 2 [1930]: 68-75).

⁴ V. A. Gurko-Kriazhin, “Abkhaziia,” *Novyi vostok* 13-14 (1926): 115.

⁵ See, in particular, William Fierman, *Language Planning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Uzbek Experienc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1); and Simon Crisp, “Soviet Language Planning since 1917-53,” in Michael Kirkwood, ed., *Language Planning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 23-45. The quote is from Agemalyogly, “K predstoiashchemu tiurkologicheskomu s” ezdu v Azerbaidzhane,” *Novyi vostok* 10-11 (1925): 216.

⁶ Davydov, “O probleme iazykov,” 18.

⁷ 法尔斯(Fars)是位于伊朗南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

⁸ See, for example, Fierman, *Language Planning*, 149-63; James Dingley, “Ukrainian and Belorussian- A Testing Ground,” in Kirkwood, ed., *Language Planning*, 180-83; V. G. Bogoraz Tan, “Chukotskii bukvar,” *Sovetskii Sever* 10 (1931): 126.

II. 如果一个词在鞑靼语中不存在,那么应尽可能将它替换掉,替代的情形可分为以下两种。

(a) 用一个人造新词替代,且这个新词是由我们语言的茎/根(stems/roots)构成的。

(b) 用一个来自旧土耳其语的借词替代,而且该借词已停止使用,或者用来自俄国境内的土耳其部落的词汇,这些部落会容易地被接受和同化。¹

经过适当地整理改编,以及相互间明显的隔离(不只是利用词典的手段(means of dictionaries))²,不同的官方语言会被“底层劳苦的民族(toiling nationals)”接受。到1928年,苏联范围内出版了66种文字的书(与1913年的40种文字相比),发行了47种文字的报纸(共出现205个非俄语标题³)。然而,有多少人真正阅读过这些书籍和报纸,并不太重要:正如苏联其他的运动,供应注定会产生需求(或供应者会对产品进行精明的处理)。一种更大的野心,还要求所有公共事务包括教育在内,都要使用民族语言(各共和国的语言和地方社区的语言)⁴。这种要求是十分必要的,之所以这样说的理由如下:第一,列宁和斯大林总是反复强调它的必要性;第二,这是克服民族猜忌的唯一方式;第三,“民族语言之间的言语互动比以往更为迅速;”⁵第四,对于所有以民族形式呈现的国民来讲,社会主义是唯一容易获取的;第五,“发达”民族包括众多个体,其民族语言就等同于官方语言,也等同于国家的名称;第六,严格的文字标准的实施致使很多人既不会正确使用民族语言,也不会使用其他非民族语言。⁶

到1927年,93.7%的乌克兰小学生和90.2%的白俄罗斯小学生使用“(本)民族语言”上课(通过“民族(nationality)”名称,基本可以看出该民族使用的语言)⁷。中学、职业学校以及大学则比较滞后,还没有采用“民族语言”,可是,似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民族认同和语言认同的完全重合。至少在理论上,一个来自什泰特勒(shtetl)的犹太人应该接受依地语(Yiddish)教育,即使他的父母更倾向于让他学习乌克兰语(而不选择希伯来语),同时,一个来自库班(Kuban')的乌克兰人,如果她父母的语言被学者和官方认为是乌克兰语,而不是俄语(或是一种库班语),那么她也必须接受乌克兰语教育。⁸正如一个官员所说,“我们不能考虑父母的愿望。我们必须教孩子他在家讲的那种语言。”⁹事实上,在苏联(USSR)的许多地方,这种方法根本无法施行,甚至还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这个目标的正当性(即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民族与自身语言的一致性,而不是共产主义下全体民族语言的透明度),却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最后,最引人注目的是,民族语言的发展与那些讲这种民族语言的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根据korenizatsiia(就字面意义而言,是“植根(taking root)”或本土化)的官方政策,各个层面的族群事务——从加盟共和国到氏族委员会(clan soviets)——都是由这些族群的代表们操作和经营的。这进一步牵涉到各“民族(nationals)”在政党系统、政府系统、司法系统和贸易团体中被优先招录,以及偏远地区的非俄罗斯民族优先“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的问题。¹⁰然而,具体的目标还不清晰,一方面,在既定的地域内,一个族群占总人口的比例,要与其成员

¹ I. Borozdin, “Sovremennyyi Tatarstan,” *Novyi vostok* 10-11 (1925): 132.

² M. Pavlovich, “Kul' turnye dostizheniia tiurko- tatarshikh narodnostei so vremeni Oktiabr' skoi revoliutsii,” *Novyi vostok* 12 (1926): vii.

³ Simon, *Nationalism*, 46. The number of Yiddish books and brochures, for example, rose from 76 in 1924 to 531 in 1930 (see Gitelman, *Jewish Nationality*, 332-33).

⁴ See, for example, Fierman, *Language Planning*, 170-76; Gitelman, *Jewish Nationality*, 351-65; James E. Mace, *Communism 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Liberation: National Communism in Soviet Ukraine, 1918-1933* (Cambridge: 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 1983), 96; Simon, *Nationalism*, 42.

⁵ Davydov, “O prblme iazykov,” 23.

⁶ The Ukrainian Commissar of Education, Mykola Skrypnyk, defined the Donbass vernacular as a “neither Russian nor Ukrainian” patois in need of proper Ukrainianization (see Mace, *Communism and Dilemmas*, 213.)

⁷ Simon, *Nationalism*, 49.

⁸ I. Bulatnikov, “Ob ukrainizatsii na Severnom Kavkaze,”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 nostei* 1 (1929): 94-99; Gitelman, *Jewish Nationality*, 341-44.

⁹ Gitelman, *Jewish Nationality*, 342.

¹⁰ For a survey, see Simon, *Nationalism*, 20-70.

占据高层职务的比例相等，这事实上就意味着所有的职务都有传统落后族群的名额空缺（根据民族志学者的观点，这将使得许多民族 [nationality] 更加“民族 [national]”）。¹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地域都是平等的或者平等地自我控制 (self-contained)，因为对“（自己的）共和国的”认同经常会超越和主导其他认同。的确，很多本土化运动都当然地认为实行共和国自决的民族（非俄罗斯民族）会比其他民族更具有民族特性，以至于如果亚美尼亚人在政府官员中的比例超过亚美尼亚人在“他们”共和国内总人口的比例，似乎也没有人会就苏联民族政策提出异议，库尔德人 [the Kurds] 只能控制他们自己的村委会 [village soviets]；其他群体在这个共和国内的代表也没有清晰稳定的优先权。² 其他的加盟共和国都没有取得亚美尼亚人那样的成功，尽管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努力尝试过（格鲁吉亚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民族是一笔“资产”，而且加盟共和国之上不存在任何以“民族”定义的实体。

尽管行政等级体制试图干预民族平等原则，然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民族政策中，把族群在形式上区分出层级的思想是不存在的。没有人对斯大林区分“民族” (nations) 和民族 (nationalities) 表示过担忧，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涵盖无数个民族团体（各种语言、文化和制度），这些民族团体被无限制地赋予了鲜明的民族的 (national) ——“不必要的”——权利（目的是发展他们语言、文化和制度）。“民族的多样性 (national diversity)” 和“民族的独特性 (national uniqueness)” 这两个关键主题，既可用于作为实现最终统一的自相矛盾的先决条件，也可以用来体现民族自身的价值。1923 年的农业展览会上，苏联 (USSR) 的符号象征包括：

撒马尔罕雄伟而古老的清真寺……；阿塞拜疆洁白的叫拜楼；一座来自亚美尼亚的华美高塔；一座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引人注目的东方大厦；一幢表面覆盖格子图案的、结实的鞑靼房屋；一些来自遥远东方、中国风格浓厚的艺术珍品；以及来自巴什基尔、蒙古-布里亚特、喀尔马克、卫拉提亚、雅库特、哈卡斯、奥斯加克和 the Samoed 的圆顶帐篷和 chums；所有这些圆顶帐篷和 chums 都被模拟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高加索高地共和国和车臣共和国境内的山脉和村庄环绕着……他们各有自己的国旗；各用自己的语言标示符号；各有自己区域的地图；各有自己的财富统计表。在每一处，民族性、个体性和独特性都被强有力地凸显出来。

³

如果苏联是一幢公共寓所，那么栖居于其中的每个家庭都有资格获得属于它自己的一个房间。“我们唯有通过自由的民族自决才能住进这幢公共寓所，”瓦列伊斯基 (Vareikis) 认为，“因为只有民族自决才能让每一个受过压迫的民族摆脱他们长期以来对大民族的猜疑，而且这种猜忌是合理合法的。”⁴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猜忌都是有合法性的。如果不承认莫斯科是“国际革命运动和列宁主义的城堡”⁵（和民主集权制唯一的真正中心）就是民族主义偏离了轨道，而苏丹·加里耶夫 (Sultan-Galiev) 和萨姆斯基 (Shums'kyi) 则有机会把它指出来。民族权利是文化“形式”的问题，它有别于政治和经济这些“本质性”的问题；但是，一切形式都最终来源于本质，并且在每个案例中“形式”和“本质”的界线划在哪里，取决于莫斯科共产党的领导者。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这种区分本身就是强制性的，虽然是暂时性的，而且形式的比例理论上虽然微不足道，但实际是相当重要的。尽管 1926 年 Mykola Khvyi'ovyi 因“背弃莫斯科”而受到斯大林的批评，斯大林重申了对进一步发展乌克兰文学的支持，并反复强调他自己在 1923 年时所作的预言：最终（不

¹ See, for instance, Borozdin, "Sovremennyi Tatarstan," 118-19; 122-23; Dimanshtein, "Desiat' let," v-vi, xvii.

² Simon, *Nationalism*, 32-33, 37.

³ A. Skachko, "Vostochnye respubliki na S. Kh. Vystavke SSSR V 1923 godu," *Novyi vostok* 4 (1923): 482-84.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⁴ Vareikis and Zelenskii, *Natsional'no-gosudarstvennoe razmezhevanie*, 59.

⁵ Stalin, *Sochineniia*, 8: 153.

是现在)“乌克兰人的无产阶级将会被乌克兰化,就像曾经是德国人的拉脱维亚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最后分别被拉脱维亚化和马扎尔化那样。”¹

然而,俄罗斯人会怎么样呢?在苏联这座公寓的中心存在一个广大而虚无的空间,这一空间没有被清楚地定义为一个房间,这个空间既没有被民族标示物标明,也没有被“它自己的”民族占领,而是居住着大量朴素而敏感的无产阶级。俄罗斯人的确是特殊的,在其他民族的地域内,他们可能是真正的少数民族,在俄罗斯,他们没有任何民族权利和机会(因为他们曾压迫过其他民族)。反对俄罗斯棚屋和俄罗斯教堂的战争是共产党发起,其理由是要求供应帐篷、*chums*和叫拜楼。实际上,民族区域范围内的“族群肯定性行动”(ethnic affirmative action),是对俄国**阶级肯定性行动**的一个彻底复制。无产阶级身份能使一个俄罗斯人受益;而非俄罗斯身份能使一个非俄罗斯人受益。“乌德穆尔特(Udmurt)”和“乌孜别克”都是非常有意义的概念,因为它们替代了阶级。“俄罗斯”,除非用来指涉大国沙文主义的源泉(这是指骄横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而不是过度的民族自决)或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历史(这是指对于所有非俄罗斯民族来说,沙皇政府的统治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否则,是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1923年3月托洛茨基(Trotsky)在列宁政策的规划中说,

大俄罗斯人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属于阶级范畴,比较简单和纯粹,容易解决。而在联邦共和国玩弄诡计的大俄罗斯人的无产阶级与阿塞拜疆、突厥斯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另一回事。²

俄罗斯人在苏联并不是唯一的非民族群体(no nation)。整个苏联也不是一个民族,这幢公寓整体上不比各房间之和大。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自1925年3月起,苏联的所有居民就开始在“一个国家”——一个拥有中央政府、集权经济、明确领土和一党专政的国家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些人(“大国沙文主义者”)将这个国家和俄国联系起来³,但是根据共产党的方针路线,苏联国内并不存在统一的民族认同、官方语言和民族文化。苏联在一定程度上和俄国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是纯粹的“民族形式”的“社会主义本质”。

当然,没有人会指责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呼吁民族形式的运动却不少,尽管大部分都是不善言辞的批评者。联共(布)的“十二大”上,几乎没有任何代表大声说出他们反对列宁/斯大林“本土化计划”的心声,最伟大的赞赏都给了对“地方民族主义”的几点零星的抨击,而不是共产党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改革运动。⁴同时,鞑靼共和国出现的大国沙文主义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抱怨:“‘近期所有权力都掌握在鞑靼人手中’;‘俄罗斯人现在生活困难’;‘俄罗斯人现正在遭到压迫’;‘俄罗斯人失业严重,找不到工作机会,大学不招收俄罗斯人’;‘所有俄罗斯人应尽快离开鞑靼’等。”⁵在Povolzh'e、西伯利亚和中亚等地,“非本土的”外来移民、教师和行政人员都憎恨官方压制他们学习那些在他们看来没有用的语言,雇用他们认为无能的“民族成员(nationals)”教孩子他们所谓“野蛮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些项目不过是有失公正的门面工程,纯属资源浪费。⁶乌克兰的农民阶级对于犹太农业殖民者的到来并不欢迎,而“代表

¹ *Ibid.*, 151.

² Quoted in Nenarokov, *K edinstvu ravnykh*, 132.

³ See, in particular, M. Agurskii, *Ideologiya natsional-bol'shevizma* (Paris: YMCA Press, 1980).

⁴ *Dvenadtsatyi s'ezd*, 554, 556, 564.

⁵ N. Konoplev, "Shire front internatsional' nogo vospitaniia,"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 nostei* 2(1931): 49. See also N. Konoplev, "Za vospitanie internatsional' nykhboitsov,"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 nostei* 4-5 (1930): 55-61.

⁶ TsGAOR, f. 1377, op. 1, d. 224, 11. 8, 32; N. Amyl'skii, "Kogda zatsvetaiut zharkie tsvety," *Severnaia Azia* 3 (1928): 57-58; Fierman, *Language Planning*, 177-85; N. I. Leonov, "Tuzemnye shkoly na Severe," *Sovetskii Sever: Pervyi sbornik statei* (Moscow: Komitet Severa, 1929), 200-4; Leonov, "Tuzemnye soveti," 242, 247-48; D.F. Medvedev, "Ukrepim soverty na Krainem Severe i zohivim ikh rabotu," *Sovetskii Sever* 1 (1933): 6-8; P. Rysakov, "Praktika shovinizma i mestnogo natsionalizma,"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 nosti* 8-9 (1930): 28; T. Semushkin, *Chukotka* (Moscow: Sovetskii pisatel', 1941), 48; I. Sergeev, "Usilit' provedenie natspolitiki v Kalmykii,"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 nosti* 7 (1930): 66; Simon, *Nationalism*, 25, 41, 73-74.

人数超出比例的 (overrepresented) ” 犹太人官员也拒绝大规模的乌克兰化。¹ 所设想的受益人并不都是心存感激的。“政治上不成熟的” 家长、学生和老师们都对民族语言教育表现出一种“反常的态度”，而又不得不被迫遵循“意第绪语化 (Yiddishization) ” 和“白俄罗斯语化 (Belorussification) ” 的道路 (因为技术上的原因，这条道路基于上没有超出中学范围，因此也似乎成了教育的一条死胡同)。² 西伯利亚地区的“落后的” 白俄罗斯移民更青睐于俄罗斯人的指令，而西伯利亚“非常落后的” 土著人认为尽管他们的知识在冻土地带还有价值，也要学习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以及那些在家不能掌握的技能。³

新经济政策仍在持续，而这些争论却被置若罔闻，因为摆脱落后的正确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但是 1928 年新经济政策终止了，同时结束的还有一切“幸存者” 的容忍。“上述革命者” 又重新恢复了最初布尔什维克的“他者” 与“落后” 之间的等式，并发誓十年之内要将它们摧毁。集体主义将会照料好农村的野蛮未开化之人，工业化将会带来城市化进程，文化改革将会“扫除文盲” (因此消灭所有的差异)。据信奉“大转变” 的人说，“一个国家内的社会主义”，意味着自我和他者的边界将很快和那个国家的国土边界一致：所有内部边界不久之后就会消失，学校与工厂融合，作家与读者融合，身体与心智融合。但是这一切会适用于所有的民族吗？这是否意味着民族区域会对必然被消除的落后作出让步？民族会像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人那样被清除掉吗，或者像农民那样被集体化？

对此，一些重要的迹象已经指明了方向。正如法学家预料法律的消亡一样，教师预料正规的教育不久之后会作废，语言学家和民族志学者期望——并且试图努力实现语言共同体和族群共同体的合并，以至到最后走向消失。⁴ 根据尼·雅·马尔 (N. Ia. Marr) 宣称马克思主义和提升强制性的“印欧语系理论 (Japhetic theory) ” 的说法，语言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因此它反映了经济基础的周期变化。各个语系作为进化的残留物，是通过全球“语言起源 (glottogony) ” 这一坚定不移的过程联合起来的，并且注定在共产主义之下融合为一体。⁵ 类似的，讲这些语言的人 (“民族”)，历史上建立的“不稳定” 的共同体，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形态而兴盛和衰落：⁶ “通过把他们从资产阶级解放出来的方式，不同的民族文化将会融合为同一种人类文化……民族是一个历史过渡阶段的分类，不代表任何早期的或永恒的事物。的确，民族的进化过程实质上是社会形态发展历史的重复。”⁷ 与此同时，加快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进度和“掌握技术” 的需求，似乎不仅要求在绝大多数“被同化的” 群体中放弃语言民族化的“荒谬” 实践，还要求尽可能最广泛地鼓励俄语的使用。⁸

然而，这并不是马尔主义者 (the marrist) 和共产党后期所抨击的语言纯净主义，⁹ 但是，这

¹ Gitelman, *Jewish Nationality*, 386, 398, 402-3.

² Davydov, “O probleme iazykov,” 22; Konoplev, “Shire front,” 50; A. Valitov, “Protiv opporunisticheskogo otnosheniia k stroitel’stvu natsskholy,”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stei* 5-6 (1932): 68.

³ I. Skachkov, “Prosveshchenie sredi belorusov RSFSR,”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stei* 3 (1931): 76. P. Kovalevskii, “V shkole- iurte,” *Sovetskii Sever* 2 (1934): 105-6; I. Nesterenok, “Smotr natsional’nykh shkol na Taimyre,” *Sovetskii Sever* 6 (1932): 84; G. N. Prokof’ev, “Tri goda v samoedskoi shkole,” *Sovetskii Sever* 7-8 (1931): 144; S. Stebnitskii, “Iz opyta raboty v shkole Severa,”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stei* 8-9 (1932): 49-51.

⁴ For professional abolitionism during the first five-year plan, see Sheila Fitzpatrick, 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ssia, 1928-1931*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On linguistics and ethnography, see Yuri Slezkine, “The Fall of Soviet Ethnography, 1928-38,” *Current Anthropology* 32, no. 4 (1991): 476-84.

⁵ Slezkine, “The Fall,” 478.

⁶ N. Ia. Marr, “K zadacham nauki na sovetском vostoке,”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stei* 2 (1930): 12; S. Asfendiarov, “Problema natssi i novoe uchenie o iazyke,” *Novyi vostok* 22 (1928): 174.

⁷ Asfendiarov, “Problema natssii,” 174.

⁸ I. Davydov, “Ocherednye zadachi prosveshcheiia natsional’nostei,”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stei* 4-5 (1930): 30-34; M. Vanne, “Russkii iazyk v stroitel’stve natsional’nykh kul’ tur,”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stei* 2 (1930): 31-40.

⁹ I. Kusik’ian, “Ocherednye zadachi marksistov- iazykovedov v stroitel’stve iazykov narodov SSSR,”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stei* 11-12 (1931): 75; E. Krotevich, “Vypravit’ nedochety v stroitel’stve Kazakjskoi terminologii,”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stei* 8-9 (1932): 94-96; Fierman, *Language Planning*, 126-129; Mace, *Communism*, 277-

个问题到 1933-1934 年之前都没有正式解决，民族文化自治的原则也从未被质疑过。正如斯大林 1930 年 6 月在联共（布）十六次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

将苏联所有民族融合为一个讲俄罗斯语的大俄罗斯民族的理论，是一种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反列宁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主要论题，根据列宁主义思想，民族差异短期内不可能消失，而是在很长时间内会继续存在，甚至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全世界胜利之后仍会存在。¹

于是，因为“民族差异、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等”会长期（相当长的时期）存在，所以民族区域实体也必须保留和加强。² 民族政策的大转型，是指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建设运动的一次迅猛加剧。俄罗斯语言的优胜地位被强制撤销³，苏联的所有生活方式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变得尽可能地具有“民族的（特性，译者注）”。如果没有可供布尔什维克人攻击的堡垒，没有可供其超额完成的计划，没有可供其变成现实的童话故事，那么，可以确信的是，掌握乌兹别克语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完成，更甭提编造涅涅茨语的“区区 600-700 个日常用语”。⁴ 1928 年 3 月 1 日，布尔什维克党驻中亚办事处、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乌兹别克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于 1930 年 9 月 1 日之前实现彻底的“乌兹别克化”。⁵ 1929 年 12 月 28 日，乌兹别克政府要求中央委员会、最高法院和劳动部、教育部、司法部和社会保障部的所有官员在两个月内学会乌兹别克语（其他部门是 9 个月时间，其他个人是一年时间）。⁶ 1931 年 4 月 6 日，克里米亚（Crimean）自治共和国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本民族在政府官员中的比例到年底时必须从 29% 上升到 50%。⁷ 1929 年 8 月 31 日，敖德萨（Odessa）多数讲俄语的居民突然醒悟过来，发现他们日常读的《艾泽斯提亚报》（*Izvestiia*）都已变为乌克兰语的 *Chornomors'ka komuna*。⁸

然而，只有城市被期待会彻底实现乌克兰化或哈萨克化。斯大林民族革命最令人惊叹的地方在于，公众对一切“少数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不是一个地区的命名民族 non-titular nationalities），不管规模多么小，对其实施文化自治的支持在急剧上升。“民族化的实质并不完全符合乌克兰化、哈萨克化和鞑靼化等观念。民族化不能仅局限于那些只与拥有共和国或省区的土著民族相关的问题。”⁹ 到 1932 年，乌克兰境内出现了俄罗斯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摩尔达维亚人、车臣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白俄罗斯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农村苏维埃（village soviets），同时哈萨克斯坦成了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俄-哥萨克（Russo-Cossack）”、乌兹别克人、维吾尔人、德国人、塔吉克人、东干人（Dungan）、鞑靼人、楚瓦什人、保加利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和莫尔多瓦人农村苏维埃的主人，这还不包括 140 个“混合”群体。¹⁰ 这是一场族群繁育（ethnic fertility）的盛宴，一个由苏联共产党赞助的生气勃勃的民族（national）狂欢节，斯大林给无产阶级革命者（Proletarshaiian revoliutsiia）的信中，抨击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并明确重申了这点。¹¹ 最后的结果是车臣人不同于印古什人（并不都讲 Vainakh 语），蒙古人不

79; Roman Smal-Stocki, *The Nationality Problem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Russian Communist Imperialism* (Milwaukee: The Bruce Publishing Company, 1952), 106-41.

¹ I. V. Stalin, *Sochineniia* (Moscow: Politizdat, 1952), 13: 4.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² *Ibid.*, 12: 365-66.

³ See, for example,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stei* 11-12 (1931): 102-6.

⁴ Fierman, *Language Planning*, 177; Evgen'ev and Bergavinov, "Nachal'niku Obdorskogo politotdela Glavsevmorputi t. Mikhailovu," *Sovetskaia Arktika* 4 (1936): 65-67.

⁵ P. Rysakov, "Praktika shovinizma i mestnogo natsionalizma," *Revoliutsiia natsional'nostei* 8-9 (1930): 29.

⁶ S. Akopov, "K voprosu ob uzbekizatsii apparata i sozdaniu mestnykh rabochikh kadrov promyshlennosti Uzbekistana," *Revoliutsiia natsional'nostei* 12 (1931): 22-23.

⁷ B. Rodnevich, "Korenizatsiia apparata v avtonomiakh i raionakh natsmen' shinstv RSFSR," *Revoliutsiia natsional'nostei* 12 (1931): 19-20.

⁸ Mace, *Communism*, 212. See also Simon, *Nationalism*, 39-40.

⁹ A. Oshirov, "Korenizatsiia v sovetskoi strane," *Revoliutsiia natsional'nostei* 4-5 (1930): 111.

¹⁰ A. Gitlianskii, "Leninskaia natsional'naia politika v deistvii (natsional'nyemen' shinstva na Ukraine)," *Revoliutsiia natsional'nostei* 9 (1931): 37; A. Zuev, "Natsmeny Kazakhstana," *Revoliutsiia natsional'nostei* 4 (1932): 48.

¹¹ Or so most people thought. Cf. Stalin, *Sochineiia* 13: 91-92 and *Revoliutsiia natsional'nostei* 1 (1932); and Iiul'skii,

同于格鲁吉亚人，卡雷尔斯人 (Karels) 不同于芬兰人 (Finns)，蓬都希腊人 (Pontus Greek) 不同于埃勒希腊人 (Ella Greek)，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与其他的民族不同 (但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因此他们都迫切需要他们自己的语言文字、出版机构和教育体系。¹ 1928 年至 1938 年间，非俄语报纸的数量分别由 47 种文字、205 个版本增长到 66 种文字、2188 个版本。² 如果出身乌克兰北部的高加索人没有他们的剧院、图书馆和文学团体组织，如果达吉斯坦 (Dagestan) 人拥有一种突厥通用语 (Turkic lingua franca) (相对于几十个不同的标准)，如果顿涅茨煤田 (Donbass) 工人的文化需求只能用“俄语、乌克兰语和鞑靼语”来满足³，都会被认为是一件丑事。苏联绝大多数官员职位和学校招生都要遵循复杂的民族配额，以达成人口和晋升比例的高度一致——根据行政等级的数量来衡量人口和晋升的情况，简直就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而且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⁴ 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座巴别塔 (Tower of Babel)，在这座塔内，位于不同楼层的不同语言将分担适宜分量的工作。甚至电焊工人 (shock-worker) 在各个工厂和生产车间的派遣也会尽一切可能地遵照民族界线来进行 (著名的斯达汉诺夫 (Stakhanovite) 女工作者，帕夏·安吉丽娜 (Pasha Angelina)，就是一个自豪的“希腊队 (Greek brigade)”成员)。⁵

然而，“大转变”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不仅仅只是新经济政策走向癫狂的表现。在很多民族政策中，它表示这是反对落后剥削 (backwardness-as-exploitation) 的最后一次战争，永久消除社会的 (以及一切?) 差异，最终跨越到永恒的无阶级状态。“大转变”的目标和认同都是合法的，只是他们受到了坏人的阻止。从 1928 年开始，真实的或者想象的非俄罗斯精英再也不声称本民族落后，或索要民族权利了。集体主义预先假定了阶级的存在，这意味着所有民族无不例外地必须生产自己的开拓者、异教徒和谋叛苏联的人。⁶ (如果阶级不能成立，性别和年龄也足够满足需要。⁷) 生活有“正面”和反面——包括民族——独立于敌对的阶级。“俄罗斯人内部的阶级斗争从 10 月的头几天开始就已经相当严重了……，不同的民族只是现在才参与其中的……”⁸ 的确，有时候社会矫正民族的原则似乎会把那一原则溶解在其他原则之中，因为当时

“Pis'mo t. Stalina—orudie vospitaniia Bol'shevistskikh kadrov,”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e* 2-3 (1932): 9.

¹ See for example I. K., “Indoevropeistika v deistvii,”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e* 11-12 (1931): 97-102; I. Kusik'ian, “Protiv burzhuaongokavkazvedeniia,”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e* 1 (1932): 45-47; I. Zhvaniia, “Zadachi sovetskogo i natsional'nogo stroitel'stva v Mingrelii,” *Revoliutsiia natsional'noe* 7 (1930): 66-72; D. Savvov, “Za podlinno rodnoi iazyk greokv Sovetskogo Soiuza,”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noe* 4 (1932): 64-74; M. Brill. “Trudiashchiesia tsygane v riady stroitelei sotsializma,”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7 (1932): 60-66; S. D., “Evreiskaia avtonomnaia oblast'--- detishche Oktiabr'skoi revoliutsii,”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6 (1934): 13-25.

² Simon, *Nationalism*, 46.

³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1 (1930): 117; A. Takho-Godi, “Problema iazyka v Dagestane,”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2 (1930): 68-75; Gitlianskii, “Leninskaia natsional'naiia politika,” 77.

⁴ See, for example, G. Akopov, “Podgotovka natsional'nykh kadrov,”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4 (1934): 54-60; A. Polianskaia, “Natsional'nye kadry Belorussii,”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8-9 (1930): 79-88; Rodnevich, “Korenizatsiia apparata”; Zuev, “Natsmeny”; E. Popova, “Korenizatsiia apparata-na vysshuiu stupen',”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7 (1932): 50-55; I. Iuabov, “Natsmeny Uzbekskoi SSR,”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9 (1932): 74-78; P. S-ch, “Partorganizatsiia natsional'nykh raionov,”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10-11 (1932): 143-48; I. Karneev, “Nekotorye tsifry po podgotovke inzhenerno-tekhnicheskikh kadrov iz korennykh natsional'noe,”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3 (1933): 86-92.

⁵ Kh. Khazanskii, I. Gazeliridi, “Kul'tmassovaia rabota sredi natsional'nykhmen'shinstva na novostroikakh,”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9 (1931): 86-91; A. Kachanov, “Kul'turnoe obsluzhivanie rabochikh-natsmen, Moskovskoi oblasti,”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6 (1932): 54-58; I. Sabirzianov, “Natsmenrabora profsoiuzov Moskvy,”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9 (1932): 69-74.

⁶ A. Mitrofanov, “K itogam partchistki v natsrespublikakh i oblastiakh,”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e* 1 (1930): 29-36; Martha Brill Olcott, *The Kazakh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7), 216-20; Mace, *Communism*, 264-80; Rakowska-Harmstone, *Russia and Nationalism*, 39-41; Azade-Ayşe Rorlich, *The Volga Tatars: A profile in National Resilience*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6), 155-56.

⁷ In other words, women and children could become default proletarians. See Gregory Massell, *The Surrogate Proletariat: Moslem Women and Revolutionary Strategies in Soviet Central Asia, 1919-192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Yuri Slezkine, “From Savages to Citizen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Soviet Far North, 1928-1938,” *Slavic Review* 51, no. 1 (Spring 1992): 52-76.

⁸ “Vskrytie klassovoi rozni.” See N. Krupskaiia, “O zadachakh natsional'nokul'turnogo stroitel'stva v sviazi s

一个执政党的发言人这样宣布“阶级斗争的强化揭露出了阶级的民族特性”，¹ 或者一个年轻的民族志学者/资料收集者得出的结论是，整个“具有民族特性的、肤浅而稚幼的观察者的系统不过是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想体系。”²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族特性都能消解在阶级之中。民族多样性的华丽言辞和民族对等原则的实践仍然是带有强制性的，并且大多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受过“清洗”的地方官员都被来自同一民族的社会精英替代了。³ 给予“民族形式（national form）”的房间数量也变了。“大转变”时期的族群认同，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族群认同减去剥削阶级所拥护和声称的“落后”认同。所谓的乌克兰解放联盟的成员被指控为民族主义的原因，并不是在于他们坚持乌克兰的独立身份、行政自治或民族语言权利——这正是苏联的官方政策，而在于乌克兰青睐的是一个来自遥远过去的、可复原的农村乌托邦，而不是一个来自邻近未来的、以民族为片段的城镇乌托邦。

他们情感上仍然是依附于那个过去的、点缀着农场和庄园的乌克兰，一个以农业为主导，土地私人所有权坚固的国家……他们反对乌克兰的工业化和苏联制定的五年计划，因为这些将改变共和国，赋予它独立的工业基础。他们嘲笑第聂伯河水电站大坝（Dnieper Hydroelectric Dam）和苏联推行的乌克兰化。他们怀疑它的诚意和重要性。他们确信没有这一切，没有原有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乌克兰化。但是他们最最害怕的还是他们在文化、文学、科学、艺术和戏剧方面的垄断地位会被夺走。⁴

依据民族来定义的共同体以及他们所宣称的特殊文化、地域、经济和政治身份（斯大林将这些视为民族权利的准则，而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民族主义”）的继续存在，从来都没被质疑过。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行，包括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带领这些共同体脱离党的基本路线——以同样的方式制造分裂的罪行，还包括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试图扰乱和阻碍苏联的工业进程。参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活动就是蓄意破坏国家，而不是“建设”国家。

1931年，“社会主义者的进攻”开始走向衰退，因为缺乏与之抗衡的敌对者，并于1934年最终停止。在发表“胜利者的代表大会（Congress of Victors）”的演说时，斯大林宣布苏联终于“摆脱一切落后和守旧的事物”，而成为了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坚固基础的工业化社会。⁵ 为了实现官方的这一目标，时间被征服了，未来就在眼前。所有的本质差异都被克服了，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奉行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研究。既然落后和贫困消失了，当初创建的那些用来处理落后问题的组织也就不需要了：妇女部门、犹太部门和北部边境地区民族援助委员会通通关闭了。儿童学被取缔，原因在于那些可能需要特殊援助的妇女、少数民族和社会弱势群体都声称已经走上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民族学也被取缔了，理由是一些当代文化仍可能是原始的或传统的。并且所有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也被禁止了，因为所有反映现实的艺术和所有苏联现实都是社会主义的。

根据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民族等于落后的思想，民族也将不得不禁止。然而，它饱经风雨，再一次重现出经受磨炼的但精力充沛的样子。“高尚的斯大林主义”没有颠覆国家建设的政策，因为大部分关注这一主题的作家使我们这样相信。⁶ 虽然改变了族群（ethnicity）的形貌，却从来没有背弃过异中求同这一“列宁主义原则”。虽然极大地削减了民族单元的数量，

obostreniem klassovoi bor'by,"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 nostei* 4-5 (1930): 19

¹ S. Dimanshtein, "Za klassovuiu chetkost' v prosveshchenii natsional' nostei,"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 nostei* 1 (1929): 9.

² N. Bilibin, "U zapadnykh koriakov," *Sovetskii Sever* 1-2 (1932): 207.

³ See, for example, Olcott, *The Kazakhs*, 219; Rakowska-Harmstone, *Russia and Nationalism*, 100-1.

⁴ D. Zaslavskii, "Na protsesse 'vyzvolentsev'," *Prosveshchenie natsional' nostei* 6 (1930): 13.

⁵ Stalin, *Sochineniia*, 13: 306, 309.

⁶ For two remarkable exceptions, see Barbara A. Anderson and Brian D. Silver, "Equality, Efficiency, and Politics in Soviet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1934- 1980,"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8, no. 4 (October 1984): 1019-39; and Ronald Grigor Suny, "The Soviet South: Nationalism and the Outside World," in Michael Mandelbaum, ed., *The Rise of Nat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1):69.

却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些单元的民族本质。撤销中亚办事处是对族群同化的呼吁，相当于撤销妇女部门是抨击性别差异的序曲一样。事实上，正如苏联获得解放的新兴妇女被期待更加“女性化”一样，实现彻底现代化的苏联各民族也应该更加具有“民族性”。阶级是唯一合法的“内涵”，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基于阶级的人员分配、投票和身份证件都已停止。¹然而“形式”差异还是允许的，民族（这一最神圣的、可证明的空洞形式的“形式”）发展、重新编排和甚至要求一些实质内容都是允许的。

20世纪30年代早期，最显著的创新是，俄罗斯人作为一个拥有权利的族群（ethnic group）出现了。因为阶级的标准已不符合实际需要，之前被抛弃的民族因素和其他因素一样，渗透到了族群之中，“民族的（national）”一词后来遭到了批评和封杀，因为已经不存在“非民族的（non-national）”。²开始时还很谨慎，但在后来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强制性越来越明显，共产党开始赋予俄罗斯人以民族历史、民族语言和一门逐渐熟悉的民族肖像学，这一学科主要由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领导——要确保进取和“热爱自由”，很清楚，这里颂扬的是一个伟大的俄罗斯民族，而不是一场伟大的革命。1934年，“去俄罗斯化（derussifying）”的俄罗斯无产阶级在“文化构建”的过程中蓄意脱离莫斯科，已经构成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而不只是一个由不耐烦引发的“过错”。³然而，俄罗斯人从没像任何其他民族一样也变成一个民族。一方面，他们没有明确定义的民族地域（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仍然是一个无序的、包揽“一切事务”的共和国，而且从未认可过一个族群的或历史的“俄罗斯”），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政党，也没有民族高等教育机构。另一方面——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俄罗斯人已越来越认同作为一个整体的苏联。

1937至1939年间，斯拉夫文字彻底取代了拉丁文字这个20世纪20年代创立的文字标准，1938年，在一场持续三年的运动之后，俄语在所有非俄罗斯学校变成了强制性的第二语言。苏联的历史逐渐地变得更具俄罗斯的特点，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高层也是如此。⁴被用来定义和描述苏联各民族之间亲密关系的“国际主义”和后来被用来描述苏联各民族间更亲密关系的“民族友谊”就成了正式的教条⁵，而且这两个词语只能用苏联通用的俄语来表达。和以前一样，没有任何人指明一个“苏联民族（Soviet nation）”的存在，或者建议应该把俄语变成所有民族地区或组织的第一语言。1938年，卡累利阿（Karelia）的芬兰语标准甚至被认为是“法西斯主义的”，那些讲芬兰语的孤儿们被强制地学习新修订的“卡累利阿语（Karelian）”，而不是作为“族际交流语言”的俄语。⁶俄罗斯人开始欺压他们的邻居，装饰公共寓所中属于他们的那部分空间（包括大厅、走廊和厨房，所有主要的决定都产生于那里），但他们没有宣称整栋公寓属于他们，或者其他（规模大的）家族没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房间。所有“房客们”之间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但是又再次保障了他们的独立性。

“大转变”时期的文化已经被定义是没有根据的、流动不定的和嘉年华式的（carnavalesque）。老人的举动像青少年，孩子的行为像成年人，女人的穿着像男人（尽管不存在反之亦然的现象），阶级交换了空间，言语也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人民、建筑、语言和民族无限制地增加、迁移和扩展，顺利地越过低地势的偏远地方。但是这种无产阶级的后现代主义是不成熟的。20世纪30年

¹ Sheila 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the Soviet Union, 1921-19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35.

² *Pervyi vsesoiuznyi s'ezd sovetskikh pisatelei, Stenograficheskii otchet* (Moscow: Khudozhestvennaia literature, 1934), 625.

³ Compare, for example, Stalin, *Sochineniia*, 8: 149-54; and S. Dimanshtein, "Bol' shevistskii otpor natsionalizmu,"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stei* 4 (1933): 1-13; S. D., "Bor'ba s natsionalizmom i uroki Ukrainy,"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stei* 1 (1934): 15-22.

⁴ Simon, *Nationalism*, 148-55.

⁵ After Stalin's speeches at the XVII party Congress and at the Conference of the Leading Collective Farmers of Tajikistan and Turkmenistan (see Stalin, *Sochineniia*, 13: 361; 14[1]: 114-115).

⁶ Paul M. Austin, "Soviet Karelian: The Language That Failed," *Slavic Review* 51, no. 1 (Spring 1992), esp. 22-23.

代的大后退是“扎根 (taking root)”或者“激进化 (radicalization)”过程中的一种文字的报复——korenizatsiia 的真正成功。”地球引力 (在双重意义上) 将建筑牢牢地依附在地面上, 农民牢牢地依附在土地上, 工人依附在工厂上, 女人依附在男人身上以及地方苏维埃政权依附于苏联国家。¹ 在同样的时间, 以一种相同的方式, 每个个体都依附和局限在一个民族内, 而且大部分民族依附和局限在他们的地域内。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 正值大学招生考试重新恢复的时期, 在设立学生档案、就业证件和对试图飞往国外人员处以死刑之前不久, 所有苏联居民都收到了内部护照, 这个护照从姓名、出生日期和地点、合法住所和民族这 4 个方面正式地定义每一个居民。一个人的姓名和合法住所可以改变, 但是民族身份不能改变。到十年期结束时, 苏联每一个儿童的民族身份都取自他们的父母: 个体的**族群身份**已经成为一种生物学的分类, 而不受文化、语言或者地理改变的影响。² 同时, 集体的**族群身份**也变得越来越具有地域性。几年前为了调节和管理已有民族而创建的行政单元, 现在成为这些民族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特征。为了列举一个典型的、且相当言之成理的理由, “一个族群拥有自己民族地域——一个共和国、省区、地区或者村庄——的事实可以证明族群就是一个被正式承认的民族……例如, 在车里雅宾斯克 (Cheliabinsk), 一个 Nagaibak 民族地区的存在必然导致这个群体成为一个特殊的民族, Nagaibak 人与鞑靼人明显不相同。”³

同样地, 自从在比罗比詹 (Birobidzhan) 成立犹太人自治区后, 犹太人也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

通过索求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土, 他们自己的国家地位, 苏联艰苦的犹太人获得了一个他们不曾有过的决定性要素, 这使他们可能作为一个科学意义上的民族而被认可。所以正如其他苏联民族完成民族统一过程一样, 因为在苏联得到了属于它自己的民族行政实体 (entity), 犹太少数民族 (national minority) 也变成了一个民族 (nation)。⁴

这种观点涉及两个重大的创新。第一, 1913 年以来的正式的民族统治集团首次过时。不同的族群地域单元 (共和国、省区、地区) 享有不同的地位, 但是也没有试图把这个官僚设置与客观的和严格进化的族群统治集团联系在一起。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之后, 学生、作家和电焊工人被给予了正式的层级划分——民族也亦然。第二, 如果一个族群共同体的合法性取决于政府授予的地域, 那么那些授予物的撤销, 会使那个共同体自动“去民族化 (denationalize)” (尽管它内部持护照的个体不一定要“去民族化”)。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到十年时期的后半期时, 政府显然已经决定, 统辖 192 种语言和 192 个官僚机构毕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教科书的生产、老师和学生都跟不上正式的“民族化 (nationalization)”进程, 完全官僚化的指令经济和集权化的新教育系统, 也要求沟通渠道必须是易控制的和流线型的, 并且那些在莫斯科大恐怖时代 (the Great Terror) 后填补高层职位的、具有自觉意识的俄罗斯的“晋升者”, 可能会赞同反俄罗斯的歧视的控诉 (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按阶级进行人员分配的利益既得者)。到十年期结束的时候, 绝大部分按照族群定义的联盟、村庄、地区和其他规模小的单元已被解散了, 一些自治共和国被遗忘了, 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学校和组织也被关闭了。⁵

但是——这是本文中最为重要的“但是”——那些已经拥有自己共和国和大量政府机构的族群, 实际上被要求加倍努力地建设独特的民族文化。正如“莫斯科的重建”从改变整个城市面貌的宏伟愿景转向集中全力创造几个完美的工艺品一样⁶, 苏联的民族政策已经放弃兼顾大量无

¹ This is, in effect, a crude summary of Vladimir Papernyi's delightful *Kul' tura Dva* (Ann Arbor: Ardis, 1985).

² On the “passport system,” see Victor Zaslavsky, *The Neo-Stalinist St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2), 92ff.

³ L. Krasovskii, “Chem nado rukovodstvovat' sia pri sostavlenii spiska narodnostei SSSR,”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 nostei* 4 (1936): 70-71.

⁴ S. Dimanshtein, “Otvét na vopros, sostavliaiut li soboi evrei v nauchnom smysle natsiui,”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 nostei* 10 (1935): 77.

⁵ Simon, *Nationalism*, 61.

⁶ Greg Castillo, “Gorki Street and the Design of the Stalin Revolution,” in Zeynep Celik, Diane G. Favro and Richard

所寄托的民族的目标，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焦点放在几个成熟的、全面武装的“民族(nations)”上。然而，族群人员配比的缩减和对苏联精英领导（“干部素质”）的最新强调，减慢甚至有时颠覆了党和政府机构的民族化进程，这极大地加剧了对民族文化的颂扬和本族知识分子的生产。不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范围内的乌兹别克共同体被保留，但是作为一个准民族国家保留下来的乌兹别克斯坦，驱除了其境内的许多外来人，而专注于它的历史和文学。苏联这件公寓整体上只有很少很少的房间留下，但是这些留下的房间将被大肆地装修，装饰品当中有家乡值得纪念的事、祖父的钟表和保存下来的可爱的全家福。

的确，1934年的苏联作家大会，通过各种方式开创性地把高尚的斯大林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是一个旧浪漫民族主义的隆重集会。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其他被正式修复的俄罗斯雕像并不是唯一的跨民族意义上的民族伟人——所有苏联的民族占据了，或将很快会获得他们的古典文学、创世之父以及民俗财富。乌克兰代表表示 Taras Shevchenko 是一个“天才”和一个“巨人”，“他在创制乌克兰文字语言中发挥的作用不亚于普希金在创制俄罗斯文字语言中发挥的作用，甚至可能更大。”¹ 亚美尼亚的代表指出他们民族的文化是“东方最古老的文化之一，”亚美尼亚的民族语言符号系统在时间上早于基督教，亚美尼亚的民族史诗，因为其“逼真的现实主义色彩、优雅、朴素而深奥的群众智慧和民主性质的故事情节”，是“世界上史诗文学中最好的例子之一”。² 阿塞拜疆的代表坚信波斯的诗人尼扎米(Nizami)是阿塞拜疆文学的一个真正经典，因为他是一个“来自 Giandzha 的突厥人”，并且 Mirza Fath Ali Akhundov 不是一个贵族作家，正如一些无产阶级批评家所指控的那样，而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兼剧作家”，他的“性格与里博耶多夫(Griboedov)、果戈理(Gogol)以及奥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ii)一样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和现实主义的。”³ 土库曼的代表告诉与会者，18世纪“土库曼诗歌的主唱者”是 Makhtum-Kuli；塔吉克的代表解释说，塔吉克文学起始于鲁达基(Rudaki)、菲尔杜西(Firdousi)、奥马海亚姆(Omar Khayyam)以及“世界上其他杰出的工艺师”；同时格鲁吉亚的代表也发表了极其冗长的演说，宣称 Shot'ha Rust'haveli'的 *The Man in the Panther's Skin* “比欧洲的智识运动还要早几个世纪，”并且远远高出但丁的成就，总的来讲，是“整个所谓的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最大的文学纪念馆。”⁴

根据党的新路线方针，所有得到官方承认的民族都应该有本民族的“伟大传统”，这些传统需要保护和完善，如果需要，甚至可以指定专业机构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来创造传统。一种文化的“伟大之处”取决于它的行政地位（从高层的加盟共和国到那些没有地域却保持着一些“文化”的民族），但是在一个既定的类别之内，所有的民族传统，俄罗斯人除外，都应该具有同等价值。就修辞学意义而言(rhetorically)，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乌克兰有时候就被说成是“二把手”(second-in-command)，而中亚经常被表述为落后的)，但就制度而言，所有民族区域都应该是完全平等的——从政党组织到教育系统。这是一种过时的苏联政策，但20世纪30年代时所做的贡献，在于积极调配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外在不均衡性，积极公平地组建了专门的——而且相同的文化生产组织。到十年期结束时，所有加盟共和国都有了他们的作家工会、剧院、剧团以及专门研究民族历史、文学和语言的民族研究院。⁵ 莫斯科批准的共和国计划呼吁要出版更多的教科书、戏剧、小说、芭蕾以及短篇小说，而且这一切都要以民族的形式呈现（这样，可以预防词典、民俗和“经典文学”系列冒着风险接近实质内容）。

如果一些共和国很难赶上其他共和国，莫斯科将会试着给予帮助。例如，1935至1936年间，

Ingersoll, eds, *Stree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Public Spa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¹ *Pervyi vsesoiuznyi s"ezd*, 43, 49.

² *Ibid.*, 104.

³ *Ibid.*, 116-17.

⁴ *Ibid.*, 136, 142, 77.

⁵ Zaslavsky,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102.

新成立的国家戏剧艺术学会 (State Institute of Theater Art) 正处在培训的过程之中, 或者已经让 11 个国家剧团完成演员招录和节目排练工作¹, 如果仍没有完成一个民族节目, 那就要积极鼓励或者提供来自 19 世纪俄国和西欧文学作品的译本(1936 年首次推出的新的巴什基尔歌剧(Bashkir Opera)是《伊戈尔王子》(Prince Igor)和《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²)。事实上,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 翻译已经成为苏联主要的产业之一, 也是千百个专业作家主要的生计来源。“民族友谊”的论题要求苏联所有民族都应该被苏联其他民族的艺术深深打动。正如高尔基 (Gorky) 所说, “我们需要分享我们过去的知识。一个白俄罗斯人了解一个格鲁吉亚人或者一个突厥人等, 这对所有加盟共和国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³ 这样不仅产生了疯狂的翻译行为, 还致使苏联历史应涵盖苏联的所有民族, 出现了向苏联听众介绍“格鲁吉亚复调音乐和白俄罗斯民间歌谣的”广播节目, 涌现出成千上百个进行巡回演出的“歌舞团”, 在乌克兰出现几十个阿塞拜疆艺术团, 在莫斯科出现了亚美尼亚诗歌晚宴, 在喀山 (Kazan) 出现了土库曼地毯展览和民族合唱团, 运动员和少先队员在全国涌现出来。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 这些活动都是苏联文化最显著 (很明显也是最不受欢迎的) 的方面之一。

当然, 民族文化的宣传和目标追求远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届作家会议后的十年内, 许多新文化组织的创始人都已过世; 大量地区遭到兼并、丧失和重新兼并; 无数个小族群单元由于被认为“没有前途”而被彻底废除; 几个民族 (nation) 和以前的“少数民族 (national minorities)”已被强行逐出他们所在的地域。同时, 俄罗斯人已经从一个重获民族历史的革命民族转变为“所有苏联民族中最出色的民族”⁴, 乃至世界历史的焦点。然而, 所有非俄罗斯的“伟大传统”的合法性还是没有遭到质疑。俄罗斯化进程 (Russia-as-progress) 的主要敌对者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这涉及到对俄国钦佩感的缺失, 以及与 korenizatsiia-as-rootedness 相反的“没有根基的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ism)”。甚至在 1936 年至 1939 年间, 当成千百个声称的民族主义分子被处以死刑时, “整个苏联国家”正热闹地庆祝菲尔杜西 (Firdousi) 的第 1000 个诞辰日, 塔吉克人声称菲尔杜西是他们的 (不是波斯人的) 文学创始人之一; 诞辰 500 周年的 Mir Ali Shir Nawai 被乌兹别克人用来作为其 (不是 Chaghatay) 文化的伟大经典; 诞辰 125 周年的 Taras Shevchenkod, 被真理报 (Pravda) 描述为“乌克兰人的一个伟大的儿子”, 是他把“乌克兰文学提到一个值得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重视的高度。”⁵ 几个民族偶像之所以在这段时期内遭到攻击, 不是因为民族偶像的原因, 而是因为他们反对俄罗斯。⁶ 同样地, 1951 年乌克兰诗人 Volodymyr Sosiura 因为一首名为“热爱乌克兰 (Love Ukraine)”的诗, 遭到了真理报的严厉批评, 这个站不脚的罪名不在于过度热爱乌克兰, 而在于没有充分感激老大哥 (苏联, 译者注)。⁷ 感激的主要理由在于, 苏联 (从波兰) 吞并了西部乌克兰, 现实了乌克兰民族国家的“重新统一”, 一个苏联/俄国的成就, 就这样被广泛地宣传为是乌克兰民族抱负的实现。

实际上, 正是在俄罗斯妄想宏伟的这段时期内, 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政治抱负理论得到了清楚而系统地阐释。1948 年 4 月 7 日, 斯大林发表的一席讲话十分类似于他 1913 年针对民族权利发表的陈述:

每一个民族, 不论规模大小, 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和特色, 这对它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也是别的民族没有的。这些特色就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宝库所做出的贡献, 也使世界文化更加

¹ North Ossetian, Iakut, Kazakh, Kirghiz, Kara- Kalpak, Kabarda, Balkar, Turkmen, Tajik, Adyge and Kalmyk (see A. Furmanova, “Podgotovka natsional’nykh kadrov dlia teatra,”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stei* 5 [1936]: 29-30).

² A. Chanyshev, “V bor’be za izuchenie i sozdanie natsional’noi kul’ tury,”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stei* 9 (1935): 61.

³ *Pervyi vsesoiuznyi s’ezd*, 43. “Turk” stands for “Azerbaijani”.

⁴ Stalin, *Sochineniia* 2(XV): 204.

⁵ “Khronika,” *Revoliutsiia i natsional’nostei* 8 (1936): 80; Rakowska- Harmstone, *Russia and Nationalism*, 250-59; Allworth, *The Modern Uzbeks*, 229-30; Yaroslav 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The Ukraine after World War II*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4), 191.

⁶ Lowell Tillet, *The Great Friendship: Soviet Historian on the Non- Russian Nationalitie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passim*.

⁷ 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15-16; Rebert Conquest, *Soviet Nationalities Policy in Practice* (New York: Praeger, 1967), 65-66.

丰富多彩。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民族，无论是小民族还是大民族，都处在相同的位置上，并且每个民族与任何其他民族都是相等的。¹

这似乎是在暗示族群（ethnicity）是普遍的、不可削减的和天生高尚的。但这不过是一部序曲而已。1950年夏，斯大林为了打倒尼·雅·马尔（N. Ia. Marr）而奋笔疾书，尼·雅·马尔是“大转变”的最后一批信徒之一，他的理论和所培养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逃脱了“马克思主义简化派和庸俗派”的宿命。² 在斯大林看来，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或者也不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语言“属于整个民族”，它穿越了社会阶级和历史，对“整个社会共享的”，“各个社会”代表各个族群共同体，这些族群共同体都拥有一种“精髓”，其“存在时间的长度是任何经济基础或任何上层建筑都无法比拟的。”³ 总的来说，它是法定的：阶级和及其“思想意识”总是来来回回地变动，但是民族始终保持不变。在一个远离社会冲突的国家里，族群（ethnicity）是唯一有意义的身份。

这是斯大林留给他的继任者的遗产，这一遗产一直存在，到1984年时还缠着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和他的继任者。当然，赫鲁晓夫（Khrushchev）起到了阻碍作用：他在为争取地方主动性的斗争中，强化了掌权的民族精英的地位，但他在抵抗民族精英的斗争中，又试图倡导一个隐藏族群身份的人事政策，甚至还通过再现“民族融合”教义的方式吓到了一些人。然而，民族融合将出现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共产主义出现得过早，以至于这一条没有被认真采纳。在这个方向上，唯一可行的途径是1959年的学校改革，允许家长在俄语学校和非俄语学校之间进行自由选择，制造“另一种”语言选择的机会。理论上，一个哈萨克人现在可以放弃俄语；实际上，一个俄罗斯人不会再被强制学习哈萨克语。⁴ 相对而言，亚美尼亚和立陶宛自认为同性质的当权者则表现出一丝忧虑，苏联“数字上较小的”族群的官僚机构已经为不可避免的语言威胁做好了准备，尽管立陶宛、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的政治精英曾奋起反抗，对此表示过坚决抵制。30年后 Oles' Honchar 对他们的争论点进行了总结：“在学校是否要学习一门民族语言——这是一个在任何公民国家都不会被提出来的问题。”⁵ 换句话说，公民国家属于族群-民族国家（ethno-national state），其官方语言直接被定义为“本土/民族的（native）”。很明显，斯大林主义的民族政策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先进的斯大林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是统辖苏联衰落时期的“集体领导机制（collective leadership）”的信条。将其合法性来源于“真实存在的”民族区域的福利国家，而不是未来的共产主义或者历史上的变革，新的官方话语已把阶级语言作为一个装饰门面，而支撑这个系统的还是民族。⁶ 每个苏联公民出生后就被附上一个特定的民族身份，这个身份贯穿个人生活的始终，从出生到高中，当公民年满16周岁时，得到官方正式确认，之后直到老死，这中间会经历成千上万次申请表、证书、问卷和接待登记表中民族身份栏的填写。这就使民族因素在学校招生中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在就业、晋升和招募指标（draft assignments）也非常关键。⁷ 在马尔主义（marrism）遭到驱除后，苏联的人类学家追溯了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生活，并提出了一个想法（raison d'être），他们不应该研究“文化”：他们的工作就是定义、分析最初的“民族（ethnos）”，使其更加清晰明了。甚至在国外，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最显著的美德就是实现“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

¹ Stalin, *Sochineniia* 3 (XVI): 100.

² *Ibid.*, 146.

³ *Ibid.*, 117, 119, 138.

⁴ See Yaroslav Bilinsky, "The Soviet Education Laws of 1958-9 and Soviet Nationality Policy", *Soviet Studies* 14, no. 2 (October 1962): 138-57.

⁵ Quoted in Isabelle T. Kreindler, "Soviet Language Planning since 1953," in Kirkwood, ed. *Language Planning*, 49. See also Bilinsky, *The Second Soviet Republic*, 20-35. Farmer, *Ukrainian Nationalism*, 134-43; Grey Hodnett, "The Debate over Soviet Federalism," *Soviet Studies* 28, no. 4 (April 1967): 458-81; Simon, *Nationalism*, 233-64.

⁶ See, in particular, Lapidus, "Ethno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355-80; Zaslavsky,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c Transition"; Farmer, *Ukrainian Nationalism*, 61-73.

⁷ Rasma Karklins, *Ethnic Relations in the USSR: The Perspective from Below* (Boston: Unwin Hyman, 1986).

所有的民族都被区分了等级——虽然理论上的依据从部落到民族的进化程度，实际的依据是区域的或社会的地位。各个既存民族的社会地位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族群配额的继续，这为把大部分的实际好处给居住在“自己”共和国内的名义上的民族成员提供了保证。这一措施60年持续实施的结果是，几乎所有“本土/民族（native）的”控制都已经凌驾于多数加盟共和国之上了：大规模的民族精英都将他们最初的晋升和他们目前的合法性，归功于他们的族群身份。¹所有依赖于莫斯科财政资助的政治和文化的实干家（entrepreneur）都对“他们的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象征十分忠诚。但是如果政治家在结构上被限制在机构内，那么知识分子将在接受专业的培训后上岗就业，生产民族文化。审查机制虽然设有限制，但是对于政党和民族大众而言，这个目标是合法的。民族知识分子中的相当大部分都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小说家，他们大部分论著都是为他们的族群而写，或直接就是关于他们族群的。²他们出版了多卷民族历史文本，发明了民族谱系，精炼了民族语言，保存了民族珍宝，同是也为民族历史的遗失部分扼腕叹息。³换句话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犹如优秀的爱国主义者——当他们的行动不像破坏的民族主义者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民族的形式似乎已经变成了实质性的内容，还因为民族主义除了狂热的崇拜形式之外，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内容。更加不祥的是，国家领导人发现要解释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代表什么也越来越困难，当戈尔巴乔夫最终摒弃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时，剩下的唯一语言就是在长期实行中磨炼相当完美的民族主义语言。

当然，苏联民族主义事业的贡献在于没有对“建设型措施”进行限制。强迫民族文化的大祭司成为其他民族文化的业余崇拜者，并设立一系列行政等级制度，以至于一些拥有特权的族群可以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干涉民族伟人的选举和继承，并把族群共同体和他们国外的亲戚和支持者隔离开来；鼓励大量移民，从而导致对稀有资源竞争的加剧，稀释民族精英的大众基础，在族群人员配额方面制造分歧。最终，也是宿命性地，它剥夺了不同民族实现政治独立的权利——这种权利是所有民族主义追求的顶峰，包括为苏联政权奠定基础的权利内在。

这就引申出苏联民族政策的另一巨大张力：共和国和民族的同时存在。⁴前者认为具有领土的国家（states）就可以成为民族（nations），后者认为最初的民族（nations）有资格组建他们自己的国家（states）。前者预期白俄罗斯的所有居民在将来的某一天会（应该）成为白俄罗斯人，后者打出“非白俄罗斯居民”这块牌来反对这种说法。苏联政府在没有试图建设一个族群意义的苏联国家或把苏联变为一个俄罗斯民族国家的情况下，承认了这两种定义，以至于当非民族的苏维埃国家（Soviet state）已经失去其苏联的意义后，这些无国家的民族（national non-states）就是唯一可能的继承人。这就把俄罗斯共和国排除在外。苏联的边界已经模糊，其认同显然已不再是族群的，其“名义上”的居民也很难区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RSFSR）和苏联（USSR）。⁵70年后，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批准的本土化政策得出它具有逻辑性的结论：不同房间的占用者把各自的大门封锁起来，却把窗户打开，同时大客厅和厨房中混乱的居住者占据着可以挠到他们后脑勺的中心位置。他们是否应该收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是否应该也关上窗户？是否应该切断天然气？是否应该把他们的“生活区”改成一个适合的公寓？

¹ See Roeder, "Soviet Federalism," 196-233.

² Rakowska-Harmstone, "The Dialectics," 10-15. Cf. Miroslav Hroch,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³ See, in particular, Farmer, *Ukrainian Nationalism*, 85-121. Also Allworth, *The Modern Uzbeks*, 258-59; Simon, *Nationalism*, 281-82.

⁴ For a remarkably elegant interpretation of this tension, see Rogers Brubaker,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Post-Soviet Eurasia: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 forthcoming in *Theory and Society*.

⁵ Victor Zaslavsky, "The Evolution of Separatism in Soviet Society under Gorbachv," in Gail W. Lapidus and Victor Zaslavsky, with Philip Goldman, eds.,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83; Leokadiia Drobizheva, "Perestroika and the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the Russians," in *ibid.*, 98-111.

【译 文】

多族群联邦国家的构建和崩溃： 为什么俄罗斯存留而苏联解体¹

亨利·黑尔（Henry E. Hale）著，王辉译²

为什么一些民族联邦制国家幸存下来，而另一些却瓦解了？对前苏联而言，这个难题尤其严峻：多族群的（multiethnic）俄罗斯联邦（Russian Federation）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变革中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然而多族群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以下简称“苏联”——译者注）却解体了。苏联与俄罗斯的关键区别在于民族联邦制度（ethnofederal institutions）的设置。苏联拥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core ethnic region），即“俄罗斯共和国”（Russian Republic）。它是一个单一的地区，其人口数量远远多于联盟的其他任何地区。这个核心族群地区促进了双重最高权威（dual sovereignty），加重了少数族群地区（minority-group regions）对安全的担忧（security fears），也促成了对一个独立于更大的苏维埃国家的俄罗斯的“想象”（imagining）。俄罗斯联邦没有一个单一的核心族群地区，取而代之的是 57 个单独的州（province，直译为“省”）。这一制度设置给予俄罗斯中央政府一种重要的能力去阻止那种瓦解联邦的离心力。这就为其他多族群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设计联邦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教训。

为什么多族群的俄罗斯联邦从极权主义统治的变革中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而先于它的多族群的苏联却在首次差额选举后不到三年就戏剧性地解体？尽管俄罗斯在 1991 年只是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但是它的后苏联阶段却与曾经的苏联有着惊人的相似，因为在 2004 年中期它包含了覆盖 53% 的国家领土的大约 32 个族群性定义的地区。此外，作为苏联最大的一部分，俄罗斯也经历了伴随苏联从共产主义统治变革时遇到的同样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这个难题更加惊人，因为在 1989 年到 1991 年摆脱了共产主义专政政权的其他联邦国家也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以和平的方式，而南斯拉夫以破坏性的暴力方式。³ 确实，在 1991 年及其后最初的几年，很多观察家的确预期俄罗斯联邦会像苏联那样沿着族群边界（along ethnic lines）解体。⁴ 一些观察家觉得“族群解体”（ethnic disintegration）的单一进程不会因苏联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而停止，并会击败俄罗斯及其他少数族群命名的子单元。车臣（分离主义）被广泛地认为是一个常态，而非例外。然而，俄罗斯在 1991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辞职后已作为国家存在了十多年。

这个难题的解答，对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双方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族联邦制——各地区被特意与特定族群相联系的联邦政治体制——作为调和民主制和族群差异的途径为政策制定者所频繁推荐。⁵ 世界上很多在地缘政治上最重要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印度、尼日利亚和俄罗斯——采用了民族联邦制的结构设置。尽管中国和巴基斯坦不是民主体制，也萌生着民族联邦

¹ 本文英文题目为“The Makeup and Breakup of Ethnofederal States: Why Russia Survives Where the USSR Fell”，刊载于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1 (March, 2005), pp. 55-70。

²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³ Bunce, 1998; Bunce, 1999; Leff, 1999.

⁴ 例如，Kapuscinski, 1994; Lapidus, 1999; Alexseev, 1999; 和 Treisman, 1999 列举了关于这一观点的其他例子。

⁵ 联邦国家是拥有 (A) 一部联邦宪法，联邦的内涵具体如 Riker (1964) 所详细说明，“(1) 两级政府统治同一土地和人民；(2) 每级政府至少在一个行动领域内是自治的；(3) 每个政府在其领域内的自治权有一定保障（即使仅仅是宪法中的一个声明）” (p. 11)；以及 (B) 至少足够的民主使得区域自治的概念有一定的意义，包括低于全国国家机构的领土统辖单元的最高级别国家机构的直接普选的任何国家。

制的结构设置。苏联的灭亡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几乎同时解体，使很多人怀疑民族联邦制自身是其原因，因为在每一个例子中，解体都是在几乎刚刚建立了民族联邦制体制后发生的。¹这确实是令人担忧的可能性：现存的和萌芽中的民族联邦制国家是否正坐在一枚制度性的定时炸弹上，而这一套政治结构不可避免地不断提升族群间的紧张度直至爆炸？因此，尽管在岱顿协定（the Dayton Accords）之后混乱的波斯尼亚采取了松散的民族联邦制体制，但是，国际社会的很多政府并没有勇气呼吁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ism”）之后用民族联邦制手段来解决其国家建设问题。²

社会科学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一些人通常关注到像捷克斯洛伐克、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苏联和南斯拉夫等案例，一直强调民族联邦制瓦解国家的可能性。³其他人往往呼吁把注意力转向印度、瑞士和西班牙等国家，他们谈的更多的是民族联邦制在分化的社会中支持民主制的能力。⁴还有一些人给出其他的解释，但是没有人声称已经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⁵就这一点而言，俄罗斯—苏联的对比也许尤其可以揭示更广泛的模式。两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如此相似，以至于我们可以排除掉很大一部分假设。

我认为苏联和俄罗斯的关键区别在于民族联邦制度的设置。苏联的特征之一就是拥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即“俄罗斯共和国”¹，它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联邦制地区，在人口数量上具有明显优势，拥有联盟的多数公民。因为核心族群地区促进了双重最高权威，加重了少数族群地区对安全的担忧，也促成了独立于联盟的核心族群认同的“想象”，所以它倾向于促使国家解体。对于苏联来讲，这一设置证实了一个致命的结合。在俄罗斯，恰恰相反，这里没有核心族群地区。尽管俄罗斯人组成了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但是根据 2004 年中期的情况看，他们并不拥有令其自身占优势地位的单一地区，而是被分成了 57 个州，与另外 32 个被指定为少数族群家园的地区共存。这一设置使得俄罗斯中央政府有强大的制度性能力来处理那些与族群性（ethnicity）和联邦制有关的离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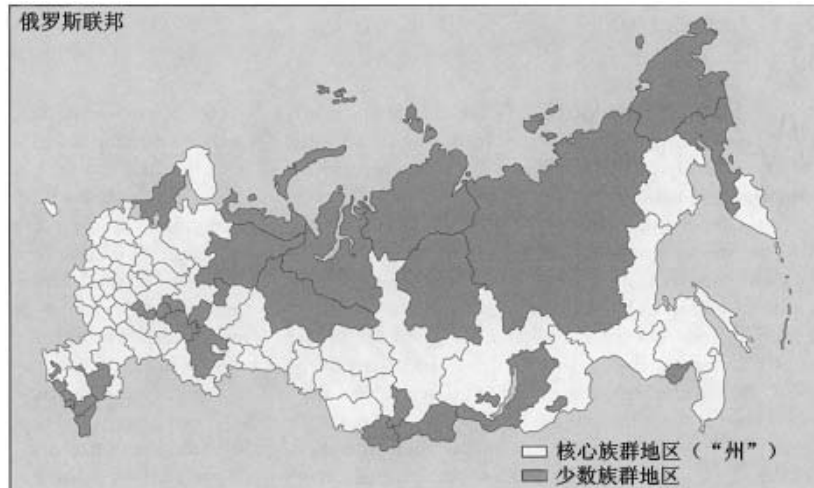
¹ 尽管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作为专政国家都存在了几十年，但是每个作为民族联邦制国家（见脚注 3 的定义）仅仅只有几年，这就是说只在 1989 年和 1990 年极小的民主和自治被授予其主要省份之后。

² 针对阿富汗建立民族联邦制的呼吁可在 Shahrani 2001 上看到，针对伊拉克的在 Rubin 2002 和 Slevin 2002。

³ 关于后共产主义的案例，见 Brubaker, 1996; Bunce, 1998; Bunce, 1999; Crawford, 1998; Laitin, 1998; Lapidus, 1992; Leff, 1999; Roeder, 1991, 1999; Slezkine, 1994; A. Smith, 1992; Suny 1993. 关于非洲的案例，见 Mozaffar and Scarritt, 1999; Wamala, 1994. 关于加拿大的案例，见 Meadwell, 1995. 对民族联邦制引起的有问题的重要动机的处理，见 Snyder, 2000a.

⁴ Brass, 1992; Gurr, 1993; Kohli, 1997; Lijphart, 1977, 1995; G. Smith, 1995.

⁵ Bunce, 1999; Hechter, 2000; Horowitz, 1985; Jalali and Lipset, 1992-93; Kohli, 1997; Leff, 1999; Lemco, 1991; Linz and Stepan, 1992, 1996; Watts, 1994.



俄罗斯幸存的谜题

针对俄罗斯幸存下来而苏联解体的原因，研究者提出了种种解释。通过简单的回顾，主要有以下几点：

区域自治的水平。瓦莱丽·邦斯（Valerie Bunce），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Mikhail Alexseev），盖尔·拉皮迪（Gail Lapidus）和爱德华·沃克（Edward Walker）认为俄罗斯之所以更倾向于幸存下来，是因为相比于在 1991 年成为独立国家的苏联的 15 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族群地区（被称为“共和国”和“自治区（autonomous regions/districts）”）被赋予了更少的制度性资源和正式权力。然而，阿尔弗雷德·斯捷潘（Alfred Stepan）却认为几乎相反的结论也许是正确的，即，俄罗斯幸存下来恰恰是因为权力的**分散**（the dispersion of power）在正在形成的联邦秩序中产生了既得利益。²

意识形态。史蒂芬·汉森（Stephen Hanson）认为，与俄罗斯不同，苏联被不为人们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所深刻影响，因此（a）导致戈尔巴乔夫（仍然是这一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没有能够认真对待族群问题；（b）联合了“族群”和“公民”两方面的民族主义者来反对苏维埃统治；（c）使得人们在概念上可以把“俄罗斯”和以意识形态定义的苏联区分开来，促进了俄罗斯脱离苏联；（d）助长了反共产主义的西方国家支持分裂主义者的运动，尽管此类支持并不总是完全的或者开放的。³

贿赂。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之所以成功地保持了完整，部分是因为以下十分明晰的政策，即，或者奖赏忠诚的地区、贿赂闹事的地区，或者通过经济转移（economic transfers）、特殊的双边条约等方式来策略性地收买特定的州，以破坏地区间的合作。⁴而苏联没有这样的政策。⁵

国境线。拉皮迪（Lapidus）和沃克（Walker）指出与俄罗斯相比，苏联的少数民族地区拥有更长的国境线。⁶

少数民族人口规模。拉皮迪（Lapidus）和沃克（Walker）观察到，俄罗斯联邦人口中有 85% 是俄罗斯族人，而在苏联总人口中俄罗斯族人仅超过 50%，这样就导致了脱离联邦的事情，在俄罗斯相比于苏联更不容易发生。他们指出，在俄罗斯联邦现有的 21 个民族共和国中，非俄罗斯

¹ 正式地讲，该共和国的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

² Bunce, 1999; Alexseev, 1999; Lapidus and Walker, 1995; Stepan, 2000.

³ Hanson, 1999. 另见 Lapidus, 1999 和 Alexseev, 1999.

⁴ Alexseev, 1999; Filippov and Shvetsova, 1999; Lapidus, 1999; Popov 2002; Solnick, 2000; Stoner-Weiss, 1999; Treisman, 1999.

⁵ Treisman, 1999.

⁶ Lapidus, 1999; Lapidus and Walker, 1995.

族人仅在其中的 5 个中占据人口的多数。¹

独立的历史。一些分析者指出，一些苏维埃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国）在 20 世纪曾是独立国家。²在俄罗斯联邦的共和国中，只有图瓦在几乎同样的时期内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是独立的国家。

经济发展的模式。亨利·海勒（Henry Hale）和赖因·塔格派瑞（Rein Taagepera）将经济作为把俄罗斯区别于前苏联的众多因素之一。总体来讲，相比于苏联的最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乌克兰），俄罗斯联邦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往往较慢。³

尽管这些分析者突出了俄罗斯联邦和苏联之间重要的区别，并且对国家的幸存和解体有影响，但是对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要求**独立或自治的水平的决定因素，只有汉森（Hanson）给出了解释。这些解释实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断言，即苏联的少数民族地区要求国家解体（通过渴望独立来表达）的水平高于俄罗斯联邦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样的解释也许是我们寻找的答案的一部分，因为如果苏联的所有组成单元都曾经全力地致力于它的完整性，那么很难想象苏联会解体。

然而，这些少数民族要求的诸因素中的任何一个或者相互组合，让然都不足以导致苏联的解体，因为它们没有一个捕捉到了真正导致苏联解体的机制。正如在研究苏联解体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所广泛流传并几乎无异议的观点那样，仅仅是在核心的俄罗斯共和国与两个少数民族加盟共和国共谋瓦解苏联之时，苏联才解体。⁴少数民族分离主义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苏联的解体，因为，恰恰是核心地区走出了瓦解联盟的决定性一步，然后赋予其足够的力量让它有效。更进一步说，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例如白俄罗斯和中亚共和国并没有期望过联盟的解体，它们只是在俄罗斯共和国基本上把这一想法强加给它们的时候，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一想法。即使是俄罗斯在瓦解苏联方面的关键共谋者乌克兰，在 1990 年以前大多数的专家也视其为相对支持联盟的地区，⁵乌克兰只是在俄罗斯共和国宣布独立后它才宣布了主权独立。⁶因此，俄罗斯在摧毁苏联时所扮演了**活跃的、甚至是主要的**角色，这一事实挫败了“少数民族独立要求”（“minority demand”）的解释，并且表明，关注多数族群的理论（a majority-focused theory）可能与实际情况更相符合。的确，上述的很多理论都认为俄罗斯族在苏联是联合而非分解的力量，而这与苏联的实际恰恰相反。因此，如果将俄罗斯的幸存归因于俄罗斯族人占俄罗斯联邦总人口的比重以及占少数民族命名地区的人口的比重都远远大于苏联，这一观点乍一看似乎有道理，但是这也令人疑惑：如果“俄罗斯人”一般扮演的是维护联盟的力量，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将最后的木桩插入苏联的心脏？

以上解释中，唯一捕捉到“核心地区反联盟行动”作为解体原因的汉森（Hanson）的解释，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尽管这样想，很有可能是合理的：即戈尔巴乔夫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导致了他采取不合理的民族政策，并且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促使俄罗斯去反对中央政府。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表明，为什么这样的因素不是简单地**削弱**苏维埃政权或者以一种更加普遍的政权更替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彻底地摧毁整个联盟国家。

一个新的理论，不需要推翻其他理论并取代它们作为某一事件的主要解释。倒不如说，这个新理论也许比其他理论更加基本，因为它实质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观察到相关事实的其他理论也是正确的。这些事实，也许是其他案例国家，或者在原初案例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重要而直接相关行为的后果。这个新理论比其他理论更简约，也代表了一种进步。我的理论并不否定最强有力的“少数民族独立要求”说，而是指向那些能够说明**不同核心族群行为**有所差别

¹ Lapidus, 1999; Lapidus and Walker, 1995.

² Lapidus, 1999, 75-76; Lapidus and Walker, 1995.

³ Hale and Taagepera, 2002.

⁴ Dunlop, 1995; Hough, 1997; Kotkin, 2001; McFaul, 2001; Suraska, 1998.

⁵ 见 Subtelny, 1994.

⁶ 在短短的几年里，像乌克兰这样看起来温和的共和国都可以成为苏联最重要的分离主义地区也警告我们不可低估俄罗斯联邦的族群省份的分离主义的潜力；正在车臣发生的冲突在最低限度暗示着这一潜力的存在。

的简单制度设计特征。这样，反过来解释了其他理论家提出的影响因素之所以具有解释力的原因。因此，我的解释不仅只是说明苏联解体而俄罗斯幸存这一赤裸裸的事实，而且也旨在说明没有被已发表的理论充分阐释的核心族群（俄罗斯）的一系列行动。

核心族群地区与民族联邦制国家的解体

相比于没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的国家，拥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体制有着更高的国家解体风险，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¹

1. **双重权力 (dual power)**。核心族群地区能够形成与中央对立的权力，从而破坏联邦国家的稳定。

2. **对安全的担忧 (security fears)**。核心族群地区能够产生或者加重少数族群地区的对自身安全威胁的担心。

3. **共同体的想象 (community imagining)**。核心族群地区能够促进一种独立于联邦国家的“核心族群”政治身份认同 (identity-based) 的概念化。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家不断指出，“双重权力”会引发变革。² 当第二个权力中心宣称拥有与联邦国家相匹敌的对人民的最高权威，并且这个敌对的中心没有被立即平时，国家就面临着瓦解的危险。如果民族联邦制体制将人口上占统治地位的族群固定在单一的核心族群地区，那么，那个核心地区就是一个天然的、预先形成的、强大的索要国家主权的潜在对手。相反，当这个占统治地位的族群地区被分成若干地区，它的成员们在进行集体行动以给国家带来双重权力威胁时，就会面临重要障碍。

核心族群地区也会造成少数族群地区对自身安全的显著担忧。这样一个核心地区往往会被认为拥有比中央政府更狭隘的本族群导向的利益诉求，并且少数族群更可能会认为这一核心地区会对中央政府产生不成比例的潜在影响。核心族群地区也被认为有能力以单方面的行动来直接威胁少数族群地区，同时破坏中央政府满足少数族群地区利益的努力。把核心族群地区进行分解，就会减轻这些担忧。通过凸现核心族群内部不同区域的利益差别，通过对核心族群影响中央政府或者直接危害少数族群地区利益的行动制造障碍，有可能实现核心族群地区的分解。

最后，当存在一个核心族群地区的时候，就非常有利于那个地区的成员（区外的人也如此）去想象一个与其边界和制度一致的单独的“族群”国家（“ethnic” state）。³ 相反，把这样一个核心族群地区分割成几个部分，就撤销了政治活动家以领土为基础的关键制度性资源，从而使以核心族群地区为背景的身份认同构建变得更加复杂化。从后者的情况来看，要为任何新近萌生的独立核心区域国家 (independent core region state) 创建一个全新的“中央”制度，政治活动家面临着巨大挑战。

这一论点让我们立即面对一个“反事实 (counterfactual) 推理”的挑战。一切支持因果律的尝试都基于反事实的断言：“A 引起 B”，即是说如果排除 A，并且保持其他任何条件不变，B 就不会产生。⁴ 尽管我们永远不可能“重新运行 (re-run) 历史”来检验这一论断，但是通过比较在环境因素方面相似的案例，我们可以尽可能采用类似于“受控实验”的方法来分析一些因素的影响力。从这个角度出发，俄罗斯和苏联的案例为上述的论点提供了影响力，因为它们控制了包括

¹ 关于这些动力性特征 (dynamics) 的更加详细的理论探究，见 Hale 2004。其他作者跟进了相关讨论，如 Lemco (1991) 和 Watts (1994) 特别指出规模上的不成比例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很多不同于此处讨论的原因。Elazar (1987) 指出当一个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联邦制往往不会很有成效。Horowitz (1985) 在其对尼日利亚的分析中发展了相似的逻辑 (p. 620)，但是他的理论阐释将他带到了别处。

² Brinton, 1965; Tilly, 1975.

³ 关于“想象的共同体”及其对国家幸存的重要性，见 Anderson, 1991 和 Beissinger, 2002。

⁴ Fearon, 1991; Keohane, King and Verba, 1994. 另见 Tetlock and Belkin, 1996; Elster, 1978.

地理、文化、历史和转型背景等众多环境因素，同时在关注的关键因素上呈现多样性——苏联拥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而俄罗斯没有。¹因此，这一结合的事实——苏联解体而俄罗斯幸存——确实具有启发性。然而，仅仅这一观察也至多是启发性的，因为即使这一情境被高度控制，但是它也不能被完全控制。

然而，如果我们可以展示不仅最终结果与理论论点相一致，而且在可观察到的事实洪流中的无数细节与从理论论点中衍生出来的假说相一致，那么对这两个国家的比较会更加引人入胜。²如果这一因果关系推断是正确的话，那么阐述对其他我们应该关注到的发生在这两个民族联邦制国家中的事情的解释就很重要了。这些假说的一个重要汇集就是上面提到的三个因果机制：双重权力，对安全的担忧，和想象的共同体。其他的则包括这些假设机制的推论，而这些推论与可观察到的事件或者相符或者相悖。为了开始更系统地思考这些检验，不仅辨认出包含其中的反事实的论断，并且将它分解为聚焦在特例上的反事实成分，这将会是有益的。这样做转会使可被检验的具体而重要的假说大量出现。上面展开的理论暗示了以下聚焦特例的反事实观点：

- 如果苏联的俄罗斯共和国曾经被分解为大量的更小单元，苏联解体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 如果俄罗斯联邦用一个单独的共和国而不是如它实际设置的 57 个“非族群”地区（本文简称为“行政主体”（*oblasts*，其下设有州））³来代表俄罗斯族，俄罗斯的稳定将会大大降低并且更容易解体。

通过检验起源于这两个观点的假说，我们更加有信心来讲，这个理论的逻辑解释了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命运的重要对照。⁴

苏 联

在这一部分，我试图论证苏联的核心族群地区俄罗斯共和国因果性地卷入了苏联解体过程。然而，我也批判性地指出，假如这些行动是被一系列分离的俄罗斯地区（州）所尝试，并没有一个联合性的“俄罗斯共和国”制度结构，那么，这些核心族群地区采取的颠覆联邦的行动就不会威胁到联邦了。（在接下来要研究的俄罗斯联邦的案例中，这一断言甚至会更加有力，因为它几乎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具体来讲，如果俄罗斯共和国分解为一些俄罗斯地区，那么这个联邦国家就会更少被双重权力、安全威胁和想象的共同体等问题所威胁：

双重权力。如果戈尔巴乔夫的强硬派对手（*hard-line opponents*）感受到的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当局的威胁再少一些，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不去发动 1991 年的 8 月政变。假如政变被视为必须的行动，它就更有可能成功地保卫联邦，而不会遭到统一的俄罗斯共和国的抵制。

安全威胁。如果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采取措施迎合那些主要的不满的共和国（尤其是乌克兰），同时规避强硬派政变的威胁，就会更容易避免这些共和国脱离联邦的行动。主要的共和国在 1991 年 8 月以后也会更容易同意重组苏联。

想象的共同体。俄罗斯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在创造一个可以威胁苏联以取代它的独立的俄罗斯的想法时，将会更加困难。

尽管俄罗斯的行动被广泛地认为应对最终打倒苏联负责任，但是他们并不是想摧毁联邦，而

¹ 实际上，这是被 Przeworski and Teune (1982)所讨论的“最相似”国家的基本方法，并且后来被 Keohane, King and Verba (1994)做了具体阐释。

² 扩大国家集合也会对检验这一假说增加影响力。在这一方向的首次尝试，见 Hale, 2004。

³ 方便起见，这个术语指的是在俄罗斯共和国和当前的俄罗斯联邦中没有明确族群名称的所有地区，即使其他的类别也在（与当前的意义没有实质上不同）：边疆区（*krais*）和莫斯科、圣彼得堡两个主要城市。

⁴ 这一策略是 Keohane、King 和 Verba(1994)所讲的“从一些中得到很多观察”（pp. 217-28）的变体。因此，接下来的经验讨论确实构成了“检验”的报告，因为它不仅报告了在关于关键的自变量的国家结果和国家测量中原初观察到的分歧，而且报告了对附加于原初假说的可观察的推论的经验调查的结果。见 Ross(2003)（引用 Daniel Posner）。

是试图以对俄罗斯更有利的方式重建它。苏联体制曾经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使俄罗斯“处于不利地位”（disadvantage），试图以此获得其他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更重要的那些民族的支持。¹因此，与其他的加盟共和国不同，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自己的科学研究院和大学，并且缺乏其他关键的苏维埃政权机构。然而，最重要的是，基于（资金与财富）转移（transfers）的市场评估的可靠分析显示出，尽管其他共和国声称俄罗斯在剥削其他加盟共和国，但是俄罗斯却是对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净捐赠者（net donor），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以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为它们供给石油和天然气。²这一补贴就允许克里姆林宫将财富转移给发展最慢的中亚共和国，使得它们相对于像阿富汗这样的邻国有一个快速的发展。叶利钦作为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大量行动，都可以被理解为试图永远地纠正俄罗斯在人口和疆域上的统治地位与在经济政策方面所感知到的劣势两者间的不公正差异。

俄罗斯共和国发起的对最高苏维埃挑战的关键性改革，是1990年3月引进了共和国层面的选举。这一选举突然使俄罗斯领导人可以对他们自己的人民负责，而无需考虑共产党领导层（正如上面所指出，共产党领导集团中没有一个单独的俄罗斯共和国党组织）。由叶利钦领导的新选举出来的俄罗斯议会采取措施，以期用其自身对共和国领土的管辖权来取代苏维埃机构的管辖权。在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declaration of sovereignty”），宣布拥有共和国的所有资源，同时声明俄罗斯法律对任何与其矛盾的苏维埃法律具有优先权。³这一文件并不是叶利钦人格魅力或者好斗性格的结果——相反，它来源于上面所提到的俄罗斯领导人面对的真实动力。叶利钦只是在前一个月勉强地被选举为俄罗斯议会的领导人，这一结果甚至是在第三轮投票才得出的；他并没有推行一个未被广泛支持的法律。事实上，是叶利钦的保守派共产主义者前任维塔利·沃罗特尼科夫（Vitaly Vorotnikov）向议会提交了国家主权宣言的第一份草稿。沃罗特尼科夫宣称，尽管仍然是在苏联的体系下，但是除非俄罗斯拥有独立的真正属性，它才有希望强大起来。⁴

“俄罗斯”主权宣言和俄罗斯选举，以及随后伴随追求主权的行动，是促成独立于苏联的“俄罗斯认同”的关键因素。⁵在他竞选并成为俄罗斯共和国首脑后的行政活动中，叶利钦野心勃勃地采纳（adopt）和改写（adapt）了非苏联的俄罗斯象征。⁶约翰·邓洛普（John Dunlop）描述了俄罗斯的这一变化。他指出，迟至1989年，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作家、苏联议会成员瓦伦丁·拉斯普丁（Valentin Rasputin）才引起公众的注意，原因在于他在一次立法机关的会议上强烈地呼吁，“也许应该离开联盟的是俄罗斯”：

这些话曾被吹毛求疵地讲出来，意图就是想强调这样的发展方向是多么荒谬。但一年后，俄罗斯宣布了主权独立，而一个单独的政治存在就让俄罗斯不再显得那么荒谬了。⁷

同时，1990年春天的选举给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带来了新的声音。戈尔巴乔夫提出新“联盟条约”——组成苏联的根本性条约——作为回应。尽管戈尔巴乔夫证实了他竭尽全力去平息少数民族共和国的独立意愿，但是他发现，自己为挽救联盟所做的努力总是被俄罗斯这个多数族群共和国所阻碍。俄罗斯最初要求各共和国之间自己协商这个条约，而无需中央政府的介入。俄罗斯领导人试图贬低联盟在国防、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上的责任。⁸俄罗斯制定了自己的经济改革计划——500天计划，而这一计划显然要求戈尔巴乔夫赋予共和国大大超

¹ Pipes, 1964; Slezkine, 1994.

² Bahry, 1991; Hogan, 1993; Watson, 1994; Dmitrieva, 1992.

³ Bagramov, 1991.

⁴ Izvestiia, 5.23, 1990, 4; Izvestiia, 5.24, 1990, 2. 关于“最高权威”的模糊性，见 Walker, 2003.

⁵ Linz and Stepan, 1996; Szporluk, 1992; Tuminez, 2000.

⁶ Tuminez, 2000.

⁷ Dunlop, 1993, 52.

⁸ 见，Vedomosti, RSFSR 1990, no. 4, 81-83; 和 Izvestiia, 8.2, 1990, 2.

过他想给的自治权。¹当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这一计划后，俄罗斯领导层决心**先斩后奏**（*fait accompli*），这样苏联“中央”就只能放手让各共和国自己去施行经济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彻底破坏了苏联的银行系统，并且向苏联中央政府在俄罗斯境内的经济资源产权提出了实质性的挑战。²这就削弱了戈尔巴乔夫影响那些难以驾驭的共和国并向他们提供资助的能力，阻碍了他在挽救联盟时的努力，而且破坏了他的诺言的可信性。“俄罗斯”是一个单一而巨大的行政单位而且是个内部可以协调的地区这一事实，令俄罗斯的大量行动成为可能，也使俄罗斯的威胁确定无疑地破坏了中央机构的权威。

在1991年8月政变期间及其后，俄罗斯共和国扮演了对联盟最具破坏性的角色。苏共中央的强硬派之所以试图发起政变，部分是被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让权的行为所激怒，在他们看来，这是对苏联的制度性挑战。内阁总理瓦伦丁·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也参与了这场政变，他引证了无数例子来为这场失败的政变辩护，那些例子都表明了俄罗斯的破坏性行动以及它凭借着自身的规模和经济实力向苏联制度构成的挑战。俄罗斯共和国不仅通过破坏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等方式来摧毁苏联政府的经济权威，而且“与苏联政府在所有问题上的对话都是要使俄罗斯政府取代苏联政府。”³同样地，被广泛认为是政变幕后主谋的卢基扬诺夫（Anatoly Lukianov）也争辩道，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决定性地置苏联于解体的路上。⁴西方的分析者也指出，国内最大的一个共和国提出了主权宣言，大大降低了其他共和国宣布独立的风险，因此，触发了一系列被称为“主权大检阅”（*parade of sovereignties*）的行动。⁵在叶利钦的带领下，俄罗斯也利用其制度性资源向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让他对强硬派采取更严厉的措施。而这就使得戈尔巴乔夫难以实施他那具有标志性的、微妙的政治伎俩，⁶即在改革体制过程中，既不失去改革者的支持，又不激怒强硬派以防被其所弹劾。

另外，俄罗斯共和国当局所提供的制度平台以及1991年6月共和国的总统直接选举所授予的合法性，允许叶利钦能够动员民众抵抗政变，并且有效地分裂了苏维埃军队，最终使得苏联宿命般地无所作为。⁷刚一收到8月19日政变的消息，叶利钦就发表了“告俄罗斯公民书”的呼吁，给政变贴上“非法”的标签并且号召地方机关追随俄罗斯（而非苏联）宪法以及俄罗斯总统法令。他动员了反政变武装力量进入俄罗斯“白宫”，并且安置他们在“白宫”周遭（当时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入住在那里），同时发表法令，呼吁俄罗斯领土上的军队的所有部队、克格勃、内政部和国防部接受他的领导，号召军人和政府官员效忠新的俄罗斯军队首脑科别茨（Kobets）将军。⁸同时，他也成功地获得了无线电通信的渠道，并且通过苏联最大的一份报纸《艾泽斯提亚报》（*Izvestiia*）发表了以上呼吁。⁹

由于这些努力的合法性仅仅来自于核心共和国俄罗斯的首脑，所以它们难以在苏联产生全国性的影响。但是它们在推翻政变和分裂苏联军队方面取得了足够的成功。密谋政变的那些人迅速发现，他们的成功取决于打败叶利钦领导的反政变的俄罗斯政权的根基。他们拟定了被称作雷霆行动（*Operation Thunder*）的计划，试图撼动当时被成千上万的叶利钦支持者包围的白宫。¹⁰叶利钦的呼吁使得军队和内政部队的关键部分，甚至克格勃的模范单位也拒绝遵守（甚至先发制人）中央要求逮捕叶利钦以及向反抗者进行攻击的命令。优秀的军事指挥官亚历山大·列别德

¹ *Izvestiia*, 8.27 1990, 3.

² 见 *Vedomosti RSFSR* 1990, no. 6, 142; Johnson, 2000; *Vedomosti, RSFSR* 1990, no. 7, 147, 149; *Vedo-mosti, RSFSR* 1990, no. 10, 173-4; *Izvestiia*, 21 August 1990, 2; *Vedomosti, RSFSR* 1990, no. 11, 188-89.

³ Pavlov, 1993, 84. 另见 24-26, 79, 83-84, 90-92.

⁴ 1993年4月23日，作者与知情者的访谈。

⁵ Lapidus, 1992; Hale, 2000.

⁶ Roeder, 1993.

⁷ Taylor, 2003.

⁸ Gorshkov and Zhuravlev, 1992.

⁹ Remnick, 1994, 471.

¹⁰ Stepankov and Lisov, 1992, 160-62.

(Aleksandr Lebed) 将军甚至建议叶利钦应该宣布控制俄罗斯境内的所有苏维埃军队，而不是通过号召战士拒绝服从密谋政变的人来促进反抗。这是一个合法的策略，只是无论它多么明智，对于一个州的领导者来讲都不适用。¹ 尽管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服从苏联的军官似乎会让叶利钦全权控制自己，但是，他们对中央苏维埃指挥机构的背叛破坏了苏联的制度连贯性，因为再也不会出现一个能够控制整个苏维埃军队的人了。虽然俄罗斯在 1991 年 9 月 9 日废除了大多数在政变期间颁布的法令，但是，对这个强制的联盟当局的损坏已经完成了。²

俄罗斯共和国不仅仅创造了致命性的双重权力的格局，锻造了独立于苏联结构的“俄罗斯”身份认同，而且其领导层发表了煽动性的宣言，并且采取威胁乌克兰的行动，从而加速了后者脱离联盟，而正是乌克兰脱离联盟的行动才最终触发了苏联最后的解体。八月政变确证了乌克兰的担忧，即戈尔巴乔夫许诺的安全和平等等都是不可靠的。正如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Leonid Kravchuk) 在他的传记中明确表示的那样，不存在任何保证，表明强硬派在将来可以重组并且发起一个更加成功的镇压。³ 尽管政变削弱了苏维埃军队的力量，从而给了乌克兰脱离联盟所需的机会，但是乌克兰没有选择立即宣布独立。相反，它宣布将根据当年 12 月 1 日的全民投票来决定是否独立。

看到叶利钦曾经支持其他共和国追求主权的行动，以此来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权，他的“盈”和戈尔巴乔夫的“亏”增加了乌克兰的担忧。叶利钦英雄主义立场创造了新的权力现实和道德权威，推进了俄罗斯的代表们来统治临时机构，并执管苏联。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叶利钦的总理伊万·西拉耶夫 (Ivan Silaev) 成为了这个新临时政府的首脑。尽管乌克兰总统不能依靠走下坡路的戈尔巴乔夫，但是这些事件也给了他足够的理由，对这位看起来无法预测而且变换无常的叶利钦甚至给以更少的信任。因此，在 1991 年 8 月 31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拉夫丘克提醒大家注意俄罗斯后政变时期的“欣狂”以及伴随其中的“对某一个体或某一民族的价值夸大”。他尖锐地质疑俄罗斯主导的过渡机构是否能够“保卫其他共和国的利益”。⁴ 此外，在乌克兰就其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两天之后，叶利钦的新闻秘书同时也是他的副总统威胁说，如果乌克兰坚持到底要脱离联盟，俄罗斯就提出领土要求。⁵ 乌克兰的领导人利用这些事件来为赞同独立的全民公决提供支持。⁶ 克拉夫丘克将叶利钦的俄罗斯视为只关注自身利益 (in its own right) 并具有威胁性的帝国主义，而这一威胁仅仅因为它与苏联中央政府的斗争而暂时地转移了目标。⁷ 假如当时俄罗斯共和国是被许多较小行政地区所替代，“俄罗斯”就无法如它实际所做的那样，用制度性的手段来接管联盟政府的各项职能，同时有效地排挤掉其他共和国并为他们的独立之磨提供面粉。此外，因为俄罗斯共和国有能力迅速将联盟军队重组在其羽翼下，并且在手中肯定拥有大量的其他全国动员资源，而几个小行政地区的领导人的领土要求则不可能像俄罗斯共和国那样对乌克兰造成那么大的威胁。

最后，正是俄罗斯共和国作出了最后的选择，即使在乌克兰已经脱离了联盟以后，俄罗斯也不再试图保留“残存的苏联”。当乌克兰于 1991 年 12 月 1 日通过全民公投，确实宣布独立时，一个“被严重削减”的苏联仍然可能被拯救下来。由哈萨克共和国的领导人纳扎尔耶夫 (Nursultan Nazarbaev) 带领的中亚共和国领导人们继续号召维持联盟；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也确实要求更紧密的整合。但是，俄罗斯在和乌克兰做最后的努力试图挽回一些志愿性联盟形式的时候，却相反地选择了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一道建立一个模糊的、非绑定的独立国家联合体，而不管先

¹ Stepankov and Lisov, 1992; Gorshkov and Zhuravlev, 1992, 111; Yeltsin, 1994; Grachev, Pavel. 访谈, Sobesednik, 1991.9, no.36, 摘录自 Gorshkov and Zhuravlev, 1992, 113-15.

² Vedomosti, RSFSR 1991, no. 37, 1458.

³ Kravchuk, 2002, 106.

⁴ Solchanyk, 1993, 350-51.

⁵ Ibid., 351-53.

⁶ Masol, 1993, 72-74. 1987-90 年期间的乌克兰总理 Vitaly Masol 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是议会的一员。

⁷ Kravchuk, 2002, 120-21.

前的 15 个苏维埃共和国是否愿意，它们都将有效地确保完全的独立。鉴于这个决定矛盾的本性以及当时很多俄罗斯的地区领导者保守的本性，简直难以相信一大批俄罗斯各州的首脑会对这一法令达成一致，各州首脑的集团当然也不可能有能力拥有俄罗斯共和国当局拍板定案的效果。

总之，对导致苏联解体的事件的考察，明确反映出，统一的俄罗斯核心共和国的存在对苏联的解体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俄罗斯共和国凭借其制度性的资源和权威，削弱了苏联的实力，使戈尔巴乔夫没有办法既自主地筹备一个可运转的新联邦，又避开潜在的左和右的反叛者。俄罗斯共和国的制度性统合，使得叶利钦能够侵蚀掉苏联的体系，成功地挑战戈尔巴乔夫权力的合法性，破坏戈尔巴乔夫与强硬派的政治平衡行动，分裂苏维埃军队和政治体系，在八月政变以后将乌克兰从重组的联盟里吓走，并且阻止乌克兰独立后残存的苏联进行重新建构。如汉森（Hanson）所讲，叶利钦也证实自己可以建构一个区别于苏联的“俄罗斯”认同，如何定义这个认同，部分地是通过与意识形态上“被玷污”的苏联相对立来实现的。¹如果一系列的州取代了俄罗斯共和国，那么非常有可能，上面的任何一点都不会获得如此的成功。当我们思考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的时候，这一点甚至就会更清楚了。在俄罗斯联邦，**确实**以一组州代替了原来苏联体制下的核心“俄罗斯共和国”，所以俄罗斯尽管面对着非常相似的压力，它却稳定得多。

俄罗斯联邦

当然，我们可以轻易地指出俄罗斯幸存的事实，并且将其与苏联解体相对照，从而表明这些案例与上面详细阐述的理论相一致。确实，俄罗斯联邦没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相反，它拥有 32 个少数族群地区（共和国，自治区（autonomous district）和自治地方（autonomous region）），以及 57 个俄罗斯人占主体的行政主体。²但是为了进一步开展因果分析，我为下列假说引证了强有力的证据：

双重权力。如果俄罗斯联邦有一个统合了俄罗斯人的核心族群地区，这个地区就会以曾经俄罗斯共和国挑战戈尔巴乔夫的统治同样的方式来挑战叶利钦的权威。对联邦权威这样的挑战，将很有可能比其他任何实际发生的挑战都更有效果。

安全威胁。如果存在一个核心族群地区，与联邦政府所代表的利益相比，它将很有可能代表更狭隘的“俄罗斯”利益；而且与独立表达各自观点的 57 个行政主体领导人相比，它对少数地区人口来讲将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此外，如果核心族群没有被俄罗斯制度性地分割为多个地区，俄罗斯的总统将会发现用迎合（accommodative）策略来笼络关键少数族群地区，同时用分而治之（divide-and-conquer）的方法来离间各行政主体，以这样的策略来解决威胁少数族群地区的潜在的安全问题，会有更大的困难。

想象的共同体。如果一个核心族群地区取代了俄罗斯的 57 个行政主体，那么由叶利钦以及他的接任者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所推行的“俄罗斯领土认同”，将会在俄罗斯联邦经受更大可能的挑战。这一挑战的形式，将是基于这些行政主体现在所占有的领土（即假定的“核心俄罗斯地区”），并排除少数族群共和国对这些行政主体形成的认同。

为了证明这些假说，我在下面证实了，自从苏联解体尤其是在 90 年代，与俄罗斯共和国曾经挑战苏联的很多方式相似，俄罗斯联邦下属各行政主体也挑战了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联邦。曾经也有联合各行政主体力量的重要尝试。然而，由于缺乏协作，这些挑战都没有对俄罗斯联邦造成真正威胁。此外，联邦政府已证实了其在瓦解集体行动问题上的熟练度，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即“分而治之”。这就是说，对核心族群的制度性分割使俄罗斯联邦中央领导集团拥有足以有效回应族群挑战的自主权。这种回应可以是迎合，也可以是强制镇压——而苏联的戈尔巴乔夫

¹ Hanson, 1999.

² 这些数字指的是 2004 年底以前的情况；2004 年底，一系列地区合并的计划开始生效。

只能嫉妒这种自主权。

最初，正如在苏联统治时期，叶利钦的俄罗斯共和国总是在资助其他加盟共和国，俄罗斯曾试图纠正这一情境。在 90 年代及以后，俄罗斯联邦的各行政主体领导者也争论说，相对于以族群定义的共和国（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它们从联邦总是拿到最差的利益短板。¹据说，相比于各行政主体，（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被给予了更优惠的经济优待，更多的政治自治权以及权力。因此，当时奥廖尔州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联邦委员会（the Federation Council）（直到 2001 年才包括了所有俄罗斯各省领导人）的主席叶戈尔·思妥耶夫（Yegor Stroev）在他的任期内反复地反对在俄罗斯地区实行“双重标准”，告诫说宪法保证所有地区平等的权利。他宣称，“所有的人都应得到他们所应得的，得到他们所赚取的，而不能以相互受损为代价获利。”²如在苏联后期各族群共和国所做的，一些行政主体甚至将这一抱怨发展到宣称它们自己为“共和国”并要求“主权”。其中最著名的尝试是 1993 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宣布自己为“乌拉尔共和国”的运动。³

在 90 年代，像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共和国那样，个别州也会频繁地在大范围的政治领域内挑战克里姆林宫的权威。尽管有时候这些挑战意味着填补由于中央政府在处理工资拖欠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危机的无为造成的空缺，但是很多时候各行政主体只是做了它们想做的，根本不顾联邦的权威。⁴一些地区也要求叶利钦辞职或者被弹劾，这在很大程度上正如叶利钦过去的行为相似。在戈尔巴乔夫手下的时候，叶利钦自己曾不时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或者被弹劾。⁵一家权威性的俄罗斯报纸估计，所有地区性法律中，包括调控产权、税收和关税的政策，有 30% 违反了 2000 年的联邦法律。⁶

这样的情节在危机时候到达了顶峰，因为在 1998 年 8 月，金融危机导致俄罗斯的 GDP 在仅仅两个月中缩水 18%，迫使中央的政治危机被拖长，而总理也在这场危机中辞职。⁷非常类似于在苏联经济危机后期，叶利钦试图将俄罗斯地区的经济揽到俄罗斯共和国的控制中，很多行政主体受 1998 年 8 月的危机所激励，也试图推行地方价格限制、对向本行政主体领土外“出口”商品进行制度控制，甚至引进形式比较粗糙的（本地）货币⁸。俄罗斯最大的地区之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领导人讲到，在 1998 年 8 月之后曾考虑过采用乌拉尔“法郎”作为当地货币。⁹在 1998 年 9 月，当经济仍然处于衰落形势，俄罗斯财政部指出，俄罗斯的 89 个地区中超过 60 个已经采取了各自的紧缩措施。¹⁰

尽管这些行动，以及试图将行政主体转变为共和国的行动，都被视为对中央控制的威胁，但是，各行政主体被分割的事实意味着他们在总体上讲不会对联邦统治造成即时的威胁。这就是说，除了中央政府，没有可靠的第二选择，因为中央政府提供全国性的商品和服务，而这些行政主体缺少这些商品和服务，但它们却没有从克里姆林宫当局那里获得足够的应对方法。假如在俄罗斯联邦中存在着一个核心的俄罗斯族群地区，不难想象它会直接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尤其是在危

¹ Solnick, 2000.

² RFE/RL *Newsline*, 9. 18, 1997; RFE/RL *Newsline*, 7. 18, 2001.

³ Herrera, 2004; Startsev, 1999.

⁴ Stoner-Weiss, 1999.

⁵ 例如，见 RFE/RL *Newsline*, 7. 1, 1998.

⁶ Reuters (Moscow), 14 May 2000, Johnson's Russia List (hereafter JRL).

⁷ RFE/RL *Newsline*, 10.20, 1998.

⁸ 关于这些行动在以下这些州的具体细节：加里宁格勒州（Kaliningrad），克麦罗沃州（Kemerovo），哈巴罗夫斯克州（Khabarovsk），克拉斯诺达尔州（Krasnodar），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Krasnoyarsk），库尔斯克州（Kursk），鄂木斯克州（Omsk），萨马拉州（Samara），斯摩棱斯克州（Smolensk），斯塔夫罗波尔州（Stavropol），沃洛格达州（Vologda），和沃罗涅日州（Voronezh），见 RFE/RL *Newsline*, 9. 9, 1998; *Boston Globe*, 9. 9, 1998; *Boston Globe*, 9. 10, 1998; RFE/RL *Newsline*, 9. 8, 1998; RFE/RL *Newsline*, 9. 22, 1998; RFE/RL *Newsline*, 10. 26, 1998; 和 *Wall Street Journal*, 10. 16, 1998, A1, All.

⁹ Interfax-FIA, 10. 9, 1998, JRL 2432.

¹⁰ RFE/RL *Newsline*, 10. 22, 1998.

机期间。

事实上，在 90 年代，这些行政主体确实尝试去集体行动，以纠正它们意识到的错误。一个联合各行政主体的领导人（这里为了方便起见，称为“行政长官”）以争取它们自身利益的早期尝试是“行政长官的联盟”（Union of Governors），这是在苏联解体后组建的。它从叶利钦政府那里得到了一些空头支票，同时，也许在敦促叶利钦通过 1993 年宪法的时候发挥了一定作用，此次的宪法表面上建立了各共和国和各行政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¹叶利钦宪法甚至设立了议会的上议院，联邦委员会（the Federation Council），明确地代表地方利益。在举行完联邦委员会席位的选举之后，法律被修改，以便使地区领导者自己及其立法机关的主席，自动成为这一机构的成员。然而，各共和国和各行政主体的领导人却在这一机构中的中心-边缘关系问题上频繁发生分歧。² 试图将其自身转变为“乌拉尔共和国”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甚至一度走得更远，并且将邻近的行政主体笼络到一起组建乌拉尔联合共和国（the United Urals Republic）。³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行政主体领导人发现阻碍他们进行集体行动的力量太强大了。导致联合失败的一个原因，是中央政权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政策。在整个 90 年代，俄罗斯政府部分地通过“收买”棘手的地区以及凭借资源的转移来“犒劳”忠实的地区两相结合的策略以维护联邦。⁴克里姆林宫与各个共和国、行政主体签订“双边条约”的努力，作为一个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专门协议的手段是尤其重要的，叶利钦自认为这一策略有帮助保护联邦的功劳。⁵在 1992 年 2 月到 2001 年之间，俄罗斯中央政府签订了 42 个这样的双边条约，以及大约 200 个相关的“协定”，其中很多是与自治州签订的，也有很多是与民族共和国签订的。⁶每一个条约代表着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资源和义务的专门的划定，莫斯科熟练地利用它们来平息潜在的集体性地方行动对其权威和政策的威胁，即使这有时候意味着制裁违反宪法的行为。例如，对双边协定的战略性地使用——“收买”奥伦堡州，确保克拉斯诺达尔不会利用其车臣边界的混乱来威胁中央权威——成功地破坏了乌拉尔联合共和国计划。⁷因此，由于几乎没有地区似乎想要拒绝中央政权提供的有利可图的贿赂，像 1996-2001 年的联邦委员会主席、奥廖尔州州长叶戈尔·思妥耶夫这样曾有志于联合各俄罗斯地区的地方领导人公开反对双边条约就不足为奇了。⁸叶利钦也有能力阻止将俄罗斯领土分裂为行政地区，他通过支持一个关键性的行政长官（例如思妥耶夫）的再选举竞标，可以拉拢这个行政长官不去凑其他行政长官试图阻碍重要的中央新方案（如经济改革）的热闹。⁹

另外，在俄罗斯联邦划分出的这些现存的行政主体，造成了它们相互之间在大量排他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上频繁发生矛盾。这些内部冲突往往压倒了试图对全国性问题上建立共同立场的尝试，从而给潜在地挑战俄罗斯联邦权威的地区性集体行动制造出另一重障碍。¹⁰其中的一个分歧，是在一直是联邦预算净捐赠者的地域广大且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与一直都是净接收者的地区之间产生的。¹¹例如，实力强大的地区在 1997 年阻止了支持联邦委员会的议案，而在 1999 年批准了一部大大弱化的法律。¹²当政治活动家竞相为 1999 年俄罗斯议会选举组建强有力的“州长阵营”

¹ 见 RFE/RL [Daily Reports] 13, 1993.

² Solnick 2000. 关于对联邦委员会更加总体性的描述，见 Remington 2001.

³ Herrera, 2004; Solnick 2000.

⁴ Treisman, 1999; Popov, 2002.

⁵ Filippov and Shvetsova, 1999; Solnick, 2000; Stoner-Weiss, 1999. 参阅，如 RFE/RL *Newsline*, 10. 31, 1997.

⁶ *Polit.Ru*, 6. 26, 2001, 13:44.

⁷ Solnick, 2000.

⁸ Filippov and Shvetsova, 1999; Solnick, 2000.

⁹ 关于此的一个例子，见 RFE/RL *Newsline*, 9. 19, 1997.

¹⁰ 例如，见时任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州长的亚历山大·列别德在 *Delovoi Vtornik* 的陈述，摘自 RIA Novosti, August 18, 1998, JRL 2317.

¹¹ 例如，一些捐赠地区曾寻求在某些领域与政策协调：RFE/RL *Newsline*, 10. 29, 1997. 这些地区的名单，见 the East-West Institute's Russian Regional Report 4 (20), 5. 27, 1999.

¹² Solnick, 2000.

（考虑到 2000 年的总统竞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成功地吸引到甚至只是所有的地方行政长官数目的接近值。所有的主要尝试不仅包括了共和国还包括行政主体，因为合作的基础涵盖了像联邦转移政策、自治权、甚至个人或商业纽带的问题。确实，各行政主体本可以通过建立联盟积极地改变其在联邦体系中的位置（从而改变其利益）来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但是叶利钦政府通过双边条约、转移支付等方式已成功地打破了它们的潜在联盟。假如这些行政主体已经被联合到一个核心的俄罗斯共和国中，“行政主体”的利益表达就不会因各地区在其他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被那么严重地阻碍。

这一制度性结构和地区性利益的多样性，再加上全局性的“俄罗斯”核心族群地区的缺位，破坏了任何试图建立对仅仅包含各州、而排除少数民族定义共和国的“核心俄罗斯”认同的努力。这一效果如此强大，以至于我都无法找到任何一个例子来表述一个以“联合的行政主体”为边界的、被概念化的“俄罗斯”。这强烈暗示了，相对于原初“俄罗斯”脱离苏联的想法——拉斯普京（Rusputin）在 1989 年苏联议会上曾对此给与讽刺，在 90 年代及其后的五年里这样一种意图对于俄罗斯民众来讲显得太荒唐了。评论者曾建议俄罗斯摆脱掉车臣或者一些其他麻烦地区，但是仍然引人注目的是，即使面对车臣的挑战，没有任何政治企业家成功地提出这样的建议方案。相反，“俄罗斯认同”，在没有单纯地基于“族群”的标准时，已主要依据整体的俄罗斯联邦甚至苏联的边界所概念化了，¹尽管在某些情况上，对个别行政主体的认同也很强。²

“分而治之”的策略以及为构建以“联合的州”为基础的“俄罗斯认同”所设置的障碍，不仅将叶利钦从他自己给戈尔巴乔夫制造的双重权力的情境中抽离出来，而且使他能够直接与少数民族地区（共和国）达成合作协定并且降低其领导层对安全的担忧。上面提到的这些州的抱怨在很多情况下是正确的：仅仅因为一些共和国以限制分裂分子的激进行动作为筹码来向中央要求这些特殊待遇（包括资源和自治权），这些共和国比起很多州能从联邦得到了更好的“待遇”。³赋予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自治权，降低了中央政府食言的制度性能力，增加了共和国抵抗入侵的制度性能力，从而也增加了中央许诺尊重共和国利益的可信度。通过离间各州，叶利钦确保了很多行政主体永远不可能像他曾阻碍戈尔巴乔夫挽救联盟的努力那样阻碍这些（利益）转移和不平等。不同寻常的是，即使出现俄罗斯金融系统于 1998 年 8 月的崩溃，在后苏联的俄罗斯唯一组织了严重的分裂挑战的共和国就是车臣。但是，在俄罗斯成为独立的国家而起可以排除苏维埃中央制度干扰的情况下贯彻这些政策时，车臣已经在苏联时期的 1991 年 11 月份宣布了独立。无论如何，车臣的独立企图永远都不会严重威胁俄罗斯联邦的统一。⁴

上述的所有发展都为普京总统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在 2000 年的选举后，他立即发起了一系列旨在“再集权化”的详尽的改革。尽管叶利钦的双边条约和“分而治之”的方法已经避免了国家的瓦解，但是它们存在很多消极的副作用，包括极不公平的法律空间，似乎各个地区是在内容不同的条款上参与了联邦。由于在混乱的 90 年代，国家瓦解的威胁被成功地遏制，普京能够利用地区领导人集体行动的问题来慢慢地消减很多被各省所享有的事实上的自治权，通过相互放弃很多双边条约来创造一个总统监督的新局面。后一方面的改革包括成立 7 个新的联邦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又包含了一些地区，任命 7 位新的总统代表来监督联邦机构——包括了如检察院和警察局等强有力的机构。普京也软硬兼施地让足够多的行政长官终止了地区领导人自动成为联邦委员会成员的这一惯例，因此，地区领导人可以轻松地聚集起来发起集体性行动的、为数不多的论坛之一就被消除了。他的行政管理也战略性地伸向了行政长官选举，通常使用强制的策略或者寻找办法根据规章细目来取消某个对手资格，以此排除或者削弱那些棘手的行政长官。尽管克里姆林宫并不总是获胜，但是它已经做得足够成功，以至于大多数的行政长官在是否公开反对中央权

¹ Tuminez, 2000.

² Herrera, 2004.

³ Treisman, 1997.

⁴ Evangelista, 2002.

威的问题上都要三思而后行。存在着很多地区并且地区存在许多彼此之间的竞争，这一事实大大地降低了克里姆林宫实施这些诡计的风险。这也意味着由一位受欢迎的俄罗斯地区领导人提出的挑战并造成可威胁整个国家的全国性强烈反应的前景已经不存在了。¹到了 2004 年，普京已能够将地方行政长官选举画上彻底的句号；作为替代方法，将由他来任命地方性立法机构批准的官员。

总体上讲，很多在这一研究领域专家的观点得到有力证据的支持。专家认为，战略性的联邦“转移”和条约政策在 90 年代保持俄罗斯的完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普京进一步的巩固行动奠定了基础。²但是，在比较研究的视角下，正是由于俄罗斯联邦具有的独特制度结构，这项政策才有可能，而这一结构在苏联并不存在。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被统合的核心族群地区俄罗斯共和国的持续挑战严重地束缚住了手脚。相比于后苏联时期的叶利钦和普京，戈尔巴乔夫既没有同样多的选择去实施战略性的既定策略，在他可以制定政策的范围内又面临着更大的局限。在苏联和俄罗斯联邦，核心族群与中央政府发生冲突的问题在根本上讲是一样的，关键性的不同之处，在于核心族群在克服集体性行动的问题以争取所想要的结果时独立于克里姆林宫的制度性能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俄罗斯民族在俄罗斯联邦中的分裂的天性帮助确保了其“帝国”的幸存，而俄罗斯民族在苏联体制下的制度性统合则导致了联盟的终结。

影响

我已论证过，俄罗斯之所以在 90 年代幸存下来而苏联却四分五裂，最重要的原因是后者拥有一个核心族群地区作为其民族联邦制结构的一部分，而前者没有。尽管这一论证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全球性的模式尚有待确证，但是在关于联邦制和族群性的文献中频繁讨论到的一些重要案例的调查，具有极高的暗示性。如果一个族群地区比第二大地区多拥有至少 20% 的全国性人口，或者构成国家人口数量的绝对多数，这一族群地区就可以被认为在人口数量上“明显地占支配地位”（因此构成一个核心族群地区）。³根据这一简单的标准，三个被最广泛引用的民族联邦制的“成功案例”——印度、西班牙和瑞士——缺少核心族群地区。⁴此外，被最普遍界定的“失败案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则拥有核心族群地区。⁵尽管这一论点还将需要经过严格的比较性学术研究来建立其可移植性，这一模式构成了初步的案例，案例中强调的逻辑一般来讲是重要的。⁶

就民族联邦制国家的幸存或者解体的可能性而言，我们从中获得的启示是什么呢？对于研究者，我力劝把注意的焦点从少数族群集团中转移出来，我们需要对占支配地位的族群集团的行为的决定因素以及它们与中央联邦政府之间、与少数族群地区的互动，予以同样的关注。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制度设计者而言，看到一个核心族群地区可能带来的危险，将会为民族联邦制提供一种可行的选择，即在分裂的社会中寻求保持国家统一和建立尚可的民主之间的平衡。尽管存在其他原因来支持或者反对民族联邦制，本文呈现的研究建议不能仅仅因为苏联甚至南斯拉夫和尼日利亚第一共和国的惨痛经历就将民族联邦制排除在外。应该被排除在外的是“拥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设计”。此外，与其为了避免失去联邦，拒斥少数族群自治权和实行镇压的政策，联邦当局最好选择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在联邦的“多元化”表现形式。

¹ 关于普京的联邦改革，见 Reddaway and Orttung, 2003 与 Reddaway and Orttung, 2004，其中包括一章由这些作者写的关于总统代表和选举的主题。

² Filippov and Shvetsova, 1999; Solnick, 2000; Stoner-Weiss, 1999; Treisman, 1999.

³ Hale (2004) 辩护并详细阐述“核心族群地区”的操作性定义，以及其他的关键概念。总结来讲，核心地区的优势越大，上面描述的动力性特征越可能显现；20% 是随意界定的临界值，以便于证明这一论点。

⁴ 关于它们的“成功案例”，见 Brass, 1992 (India); Kohli, 1997 (India); Leff, 1999 (Spain); Lijphart, 1996 (India); Linz and Stepan 1992 (Spain); G. Smith, 1995, 3 (Switzerland); Snyder, 2000b, 274 (India).

⁵ Bunce 1998; Bunce 1999; Crawford 1998; Leff 1999; Roeder 1991; Wamala 1994; Horowitz 1985.

⁶ Hale (2004) 在经验性上建立全球性模式进行了首次尝试。

有核心族群地区的国家并不是全部都会分裂。一些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国家（如比利时）**幸存**下来了，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存在复杂的权力共享机制。一些没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国家避免了国家解体，但是继续经历着孤立的分裂主义者的挑战（如车臣对俄罗斯造成的困扰）。强有力的证据也表明，民族联邦制通过“族群”制度化措施一般都会增强族群间的差别。¹因此，即使采纳了没有核心族群地区的民族联邦制，试图确保国家统一的政策制定者应当贯彻额外的策略来促进和平的群际关系。这些策略包括制度性设置²、人群之间的动议权（people-to-people initiatives）³、社区间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⁴。

我希望本文已经详细阐明了，民族联邦制的最佳效果在一些条件下更有可能实现，同时最不稳定的动力性因素也被最小化。我们也许不赞同政治体系将**族群认同**凌驾于**市民认同**或**个体认同**，但是有时候因为族群主导的冲突已经盛行于世，所以集团政治不可避免。尽管有人倡议对在一定程度上是地域性集中的集团实行分割（partition），但是分割是一种有问题的替代选择，它总是包含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因为社区之间几乎不会完全分离，并且也几乎不会被简单的可防御的边界所阻隔。⁵此外，令人难以抗拒的国际利益也许会阻碍区域划分。例如，很多人担心，从伊拉克划分出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Kurdistan）将会导致该地区的不稳定，因为在伊朗和土耳其也存在着库尔德人口，而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强烈反对库尔德独立。如果经过合理设计，民族联邦制可能无需彻底的镇压就可避免国家解体。

我的论文对解决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具体问题也有启示意义。例如，如果阿富汗的困境继续下去，而且它的领导人选择联邦制解决路径的话，⁶为人数众多的普什图族（Pashtun）单独创造一个地区，而把其他地区留给其他族群（比如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哈扎拉人）将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的普什图地区就会构成一个核心族群地区。伊拉克的少数族群以及小布什政府的一些官员表示出了对民族联邦制的偏好，将其视为解决族群多样性以及在后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地区性集团之间的冲突历史的一个途径⁷。然而，参考苏联的例子，给该国的多数族群（或接近多数族群）**什叶派**阿拉伯人分出一块单一的联邦领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会孤立侯赛因的根基**逊尼派人**。这样一个什叶派地区将会构成核心族群地区，这就可能启动上面提到的很多问题，即使不会发生类似于在南斯拉夫那样的惨重连环事件，也会危及国家的统一。

政策制定者和世界领导者能够对他们在今天的欧洲和亚洲面对的主要决定的可能结果获得关键性的洞见。例如，由塞族共和国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这两部分组成的脆弱的波斯尼亚联盟，在北约军队撤回时似乎处于解体的危险中。此外，尽管制度理论典型地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包含的国家数目越多，整合的计划就越困难，但是，基于直觉，我的理论为欧盟推荐了一个相反的效应：其成员数量越多，德国就越有较少的可能在行为上像一个核心族群地区或者被视为核心族群地区对待。最后，返回到俄罗斯联邦的案例，这里发展出来的思维逻辑将打消总统普京接受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的呼吁，即戏剧性地减少州的数量，因为这就会使核心的俄罗斯族群集团的集体性行动（并且由此对联邦主权造成集体性挑战）更容易，从而危及联邦。带有悖论性的结论是，这类国家的统一恰恰有赖于维持甚至增加它们的内部行政分区（division）。

参考文献：

Alexseev, Mikhail A. 1999. Center-periphery conflict in post-Soviet Russia: A federation imperiled.

¹ Bunce, 1999; Crawford, 1998; Leff, 1999; Meadwell, 1995; Roeder, 1999; Snyder, 2000a.

² Horowitz, 1993; Lijphart, 1995.

³ Kaufman, 2001.

⁴ Varshney, 2001; Varshney, 2002.

⁵ 在这种极端条件下的一个最主要的分区倡议来自 Kaufmann, 1996, 1998。对分区的一个重要的批评可以在 Sambanis, 2000 那里找到。

⁶ Shahrani, 2001.

⁷ Rubin, 2002; Slevin, 2002.

- New York: St. Martin's.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 Bagramov, Eduard, ed. 1991. *Ksoiuzu suverrenykh narodov [Toward a union of sovereign peoples]*. Moscow: Institut Teorii i Istorii Sotsializma TsK KPSS.
- Bahry, Donna. 1991. The union republics and contradictions in Gorbachev's economic reform. *Soviet Economy* 7 (3): 215-55.
- Beissinger, Mark R. 2002. *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ss, Paul R. 1992. 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India. In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ed. Alexander J. Motyl, 99-12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rinton, Crane. 1965. *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Brubaker, Rogers. 1996. *Nationalism reframed: 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nce, Valerie. 1998.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end of the Soviet stat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st-Soviet Affairs* 14 (4): 323-54.
- Bunce, Valerie. 1999.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awford, Beverly. 1998. Explaining cultural conflict in ex-Yugoslavia: Institutional weakness, economic crisis,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The myth of ethnic conflict: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al" violence*, ed. Beverly Crawford and Ronnie D. Lipschutz, 197-26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Research Series, no. 98. Berkeley.
- De Villiers, Bertus, ed. 1994. *Evaluating federal systems*.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 Dmitrieva, Oksana. 1992. *Regional'naiia ekonomicheskaiia diagnostika [Regional economic diagnosis]*. St. Petersburg, Russia: Izdatel'stvo Sankt-Peterburgskogo Universiteta Ekonomiki i Finansov.
- Dunlop, John. 1993. Russia: confronting a loss of empire. In *Nations and politics in the Soviet successor states*, ed. Ian Bremmer and Ray Taras, 43-7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unlop, John. 1995. *The rise of Russia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lazar, Daniel. 1987. *Exploring Federalism*. Tuscaloosa,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Elster, Jon. 1978. *Logic and society*.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Evangelista, Matthew. 2002. *The Chechen wars: Will Russia go the way of the Soviet Un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Fearon, James D. 1991. Counterfactuals and hypothesis testing in political science. *World Politics* (43) 2: 169-95.
- Filippov, Mikhail, and Olga Shvetsova. 1999. Asymmetric bi-lateral bargaining in the new Russian Federation: A path-dependence explana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2 (1): 61-76.
- Gorshkov, M. K., and V. V. Zhuravlev, eds. 1992. *Krasnoe ili beloe? [Red or white?]* Moscow: Terra.
- Gurr, Ted Robert. 1993. *Minorities at risk: A global view of ethno-political conflict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 Hale, Henry E. 2000. The parade of sovereignties: Testing theories of secession in the Soviet sett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0 (1): 31-56.
- Hale, Henry E. 2004. Divided we stand: Institutional sources of ethnofederal state survival and collapse. *World Politics* 56 (2): 165-93.
- Hale, Henry E., and Rein Taagepera. 2002. Russia: consolidation or collapse? *Europe-Asia Studies* 54 (7): 1101-25.
- Hanson, Stephen. 1999. Ideology, interests, and identity. In *Center-periphery conflict in post-Soviet Russia: A federation imperiled*, ed. Mikhail A. Alexseev, 15-46.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Hechter, Michael. 2000.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rera, Yoshiko. 2004. *Imagined economies: The sources of Russian region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gan, William W. 1993. *Oil and ga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Market impacts and reform challenges*.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 Horowitz, Donal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rowitz, Donald L. 1993. Democracy in divided societ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4 (4): 18-38.
- Hough, Jerry F 1997.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1985-1991*.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Jalali, Rita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1992-93. 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A global perspectiv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7 (4): 585-606.
- Johnson, Juliet. 2000. *A fistful of rubl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Russian banking syste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puscinski, Ryszard. 1994. *Imperiu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Kaufman, Stuart J. 2001. *Modern hatreds: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n, Chaim. 1996. Possible and impossible solutions to ethnic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4): 136-75.
- Kaufmann, Chaim. 1998. When all else fail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2): 120-56.
- Keohane, Robert O., Gary King,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ohli, Atul. 1997. Can democracies accommodate ethnic nationalism? Rise and decline of self-determination movements in Indi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 (2): 325-44.
- Kotkin, Stephen. 2001. *Armageddon averted: The Soviet collapse, 1970-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avchuk, Leonid. 2002. *Maiemo te, shcho maiemo: spohady i rozdumy [We have what we have: recollections and reflections]*. Kyiv: Stolittia.
- Laitin, David D. 1998. *Identity in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apidus, Gail W. 1992. From democratization to disintegration: The impact of perestroika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From union to commonwealth: Nationalism and separatism in the Soviet republics*, ed. Gail W. Lapidus and Victor Zaslavsky, with Philip Goldman, 45-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1999. Asymmetrical federalism and state break-down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5 (1): 74-82.
- Lapidus, Gail W, and Edward W. Walker. 1995. Nationalism, regionalism, and federalism. In *The new Russia: Troubled transformation*, ed. Gail W. Lapidus, 79-114.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Leff, Carol Skalnik. 1999. Democratiz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multinational states. *World Politics* 51 (2): 205-35.
- Lemco, Jonathan. 1991. *Political stability in federal governments*. New York: Praeger.
- Lijphart, Arend.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1995. Self-determination vs. pre-determin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power-sharing systems. In *The rights of minority cultures*, ed. Will Kymlicka, 275- 8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1996. The puzzle of Indian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0 (2): 258-68.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2.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electoral sequences: Spain, the Soviet Union, and Yugoslavia. *Daedalus* 121 (2): 123-39.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Masol, Vitaly. 1993. *Upushchennyi shans [Foregone chance]*. Kyiv: Molod'.
- McFaul, Michael. 2001. *Russia's unfinished revolution: Political change from Gorbachev to Puti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eadwell, Hudson. 1995. Breaking the mould? In *Notions of nationalism*, ed. Sukumar Periwal, 129-161. Budapest: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 Mozaffar, Shaheen, and James R. Scarritt. 1999. Why territorial autonomy is not a viable option for managing ethnic conflict in African plural societie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5 (3-4): 230-51.
- Pavlov, Valentin, 1993, *Avgust iznutri: Gorbachev-putch [August from the inside: the Gorbachev-putsch]*. Moscow: Delovoi Mir.

- Pipes, Richard. 1964.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Communism and nationalism, 1917-1923*. Rev.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pov, Vladimir. 2002. *Fiscal federalism in Russia: Rules versus electoral politics*. Manuscript, JEL Classification: H7, P2, R5. www.nes.ru/publicpresentations/Papers/Popov.htm. Accessed July 29, 2002.
- Przeworski, Adam, and Henry Teune. 1982.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Malabar, FL: Krieger.
- Reddaway, Peter, and Robert W. Orttung, eds. 2003. *The dynamics of Russian politics: Putins reform of federal-regional relations*, vol. 1. Bould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Reddaway, Peter, and Robert W. Orttung, eds. 2004. *The dynamics of Russian politics: Putins reform of federal-regional relations*, vol. 2. Boulder: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Remington, Thomas E. 2001. *The Russian parliament: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a transitional regime, 1989-1999*.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emnick, David. 1994. *Lenin's tomb: The last days of the Soviet empire*. New York: Vintage.
- Riker, William H. 1964. *Federalism: Origin, operation, significa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Roeder, Philip G. 1991. Soviet federalism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World Politics* 43 (2): 196-232.
- Roeder, Philip G. 1993. *Red sunset: The failure of Soviet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eder, Philip G. 1999. Peoples and states after 1989: The political costs of incomplete national revolutions. *Slavic Review* 58 (4): 854-82.
- Ross, Michael. 2003. Testing inductively-generated hypotheses with independent data sets. *APSA-CP* 14 (1): 14-16.
- Rubin, Michael. 2002. What do Iraqis think about life after Hussein? *New York Times*, August 9.
- Sambanis, Nicholas. 2000. Partition as a solution to ethnic war: An empirical critique of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World Politics* 52 (4): 437-83.
- Shahrani, Nazif. 2001. Afghanistan can learn from its past.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 Slevin, Peter. 2002. Undefined U.S. plans for post-Hussein Iraq stir question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0.
- Slezkine, Yuri. 1994. The USSR as a communal apartment, or how a socialist state promoted ethnic particularism. *Slavic Review* 53 (2): 414-52.
- Smith, Anthony D. 1992. Ethnic identity and territorial na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Motyl* 1992, 45-65.
- Smith, Graham, ed. 1995. *Federalism: The multiethnic challenge*. New York: Longman.
- Snyder, Jack. 2000a.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 Snyder, Jack. 2000b. Managing ethno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An assessment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minority participatio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State-building, democracy, and ethnic mobilization*, ed. Jonathan P. Stein, 269-86. Armonk, NY: M. E. Sharpe.
- Solchanyk, Roman. 1993. Russia, Ukraine and the imperial legacy. *Post-Soviet Affairs* 9 (4): 337-65.
- Solnick, Steven L. 2000. Is the center too weak or too strong in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Building the Russian state: Institutional crisis and the quest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ed. Valerie Sperling, 137-56. Boulder, CO: Westview.
- Startsev, Yaroslav. 1999. Gubernatorial politics in Sverdlovsk oblast'. *Post-Soviet Affairs* 15 (4): 336-61.
- Stepan, Alfred. 2000. Russian federa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st-Soviet Affairs* 16 (2): 133-76.
- Stepankov, V. G., and Ye. K. Lisov. 1992. *Kremlevskit zagovor*. Moscow: Ogonek.
- Stoner-Weiss, Kathryn. 1999. Central weakness and provincial autonomy: Observations on the devolution process in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15 (1): 87-106.
- Subtelny, Orest. 1994. *Ukraine—a history*. 2nd e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raska, Wisla. 1998. *How the Soviet Union disappeared: An essay on the causes of dissolu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zporluk, Roman. 1992.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After the Soviet Union*, ed. Timothy J. Colton and

- Robert Legvold, 85-112. New York: W. W. Norton.
- Taylor, Brian D. 2003. Politics and the Russian army: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1689-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etlock, Philip E., and Aaron Belkin. 1996.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orld politics: 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Counterfactual thought experiments in world politics: Logical, method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Philip E. Tetlock and Aaron Belkin, 1-3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illy, Charles. 1975. Revolution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 ed.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483-555.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Treisman, Daniel. 1997. Russia's ethnic revival: The separatist activism of regional leaders in a post communist order. *World Politics* 49 (2): 212-49.
- Treisman, Daniel. 1999. After the deluge: Regional crises and political consolidation in Russi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Tuminez, Astrid. 2000. Russian nationalism since 1856: Id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Varshney, Ashutosh. 2002.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arshney, Ashutosh. 2001.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l society: India and beyond. *World Politics* 53 (3): 362-98.
- Walker, Edward. 2003. Dissolution: Sovereignty and the breakup of the Soviet Union.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 Wamala, Augustine. 1994. Federalism for Africa. In De Villiers 1994, 251-67.
- Watson, Robin A. 1994. Interrepublic trade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Post-Soviet Geography* 35 (7): 371-408.
- Watts, Ronald L. 1994. Contemporary views on federalism. In De Villiers 1994, 1-29.
- Yeltsin, Boris. 1994. The struggle for Russia. New York: Times Books.

【编 后】

近期《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刊载的一些篇翻译文章，凡是注出“译者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的，都是2010年秋季北大社会学系“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的翻译作业。由于完成作业的要求时间很短，文章的难度很大，学生在理解和翻译中的错误在所难免。同时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们也不可能对这些译文进行仔细校对，通过《通讯》提供给大家，仅供参考之用。如果读者在阅读中对一些词句不理解或有疑惑，请查对英文原文。英文原文出处在译文标题的脚注中已经提供。如果需要，也可通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要原文的PDF（影印）版本。

我们认为这些英文论文向我们展示了西方学者对苏联民族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分析，其中有些思路和素材可提供给国内研究者作为参考，有必要介绍给国内学术界。由于涉及版权问题，这些译文无法在国内正式学术期刊上发表，但是把基本内容翻译出来，在学术界同人内部分享的《通讯》上加以介绍，我们觉得还是有意义的。中国的民族理论、制度和政策在许多方面与苏联相似，看看西方学者怎样解剖和分析苏联的民族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开拓思路和视野。

对于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我们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李健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